四川通史丛书

# 成汉史略

杨伟立 著



重庆出版社

·四川通史丛书·

# 成 汉 史 略

杨 伟 立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　重庆

封面设计：王仲莉

成 汉 史 略　　　　杨 伟 立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125　插页2　字数84千
1983年1月第一版　　　　1983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书号：11114・19　　　　定价：0.37元

# 《四川通史丛书》编辑说明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是我国人口最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一个省，在我们祖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深入开展四川地方历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祖国的历史内容，为她增添生动的篇章卷页；而且还能在掌握省情、总结经验教训方面，为我省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同时还可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四川通史丛书》的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四川历史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促进学术交流，为最终写成一部质量较高的多卷本《四川通史》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川通史丛书》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通史丛书》编辑组编，是四川历史研究的学术园地。它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从古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艺术、科技、宗教、民族、考古等各个方面。凡属上述范围而又能体现四川历史特点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论是论文或专著，不限篇幅大小，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具

有一定科学水平，我们均表欢迎，并陆续编辑成书。我们热忱希望一切关心、爱好四川历史的同志多多给予支持帮助，以便共同办好这个园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四川通史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

# 前　言

旧史所称“五胡十六国”的一百三十多年间，中国境内在司马氏的晋政权之外，先后出现过賨、匈奴、羯、汉、鲜卑、氐、羌等民族[1]建立的二十三个地方割据政权，这是分裂状态下的国中之国。其中首先建立的是賨人李特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二年）在成都建号的大成国，后李寿改称汉国。

成·汉政权共历六世四十五年。李雄统治的三十年是成·汉的鼎盛时期，疆域不断扩大，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显著，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起中原战乱之区，大成国称得上一片安静土。李班以后，由于李氏皇族内部斗争，严重削弱了力量，加之政治暴虐，僚人反抗，因而江河日下，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为东晋大将桓温所灭。

关于这段历史，当时人已经写下专门著述。据常璩说：“汉嘉太守蜀郡杜龚敬脩亦著《蜀后志》，及（疑衍——引者）志赵廞、李特叛乱之事”（《华阳国志·后贤志·常宽传》）。成·汉的史官常璩也著有《汉之书》。杜龚的《蜀后志》在《隋书·经籍志》中没有著录，也许就是常璩修《汉之书》时所采用的稿本。《汉之书》虽见隋、唐《志》著录，而《册府元龟》并没有征引，《太

平御览》引录很少，以后也就亡佚了。清人汤球仅辑得七条。幸好，常氏入晋以后著的《华阳国志》流传下来，算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成·汉史的第一手资料。北魏崔鸿根据常璩的《汉之书》写成的《十六国春秋·蜀录》原书在北宋时又已亡佚，《太平御览》引了不少，也远远不是崔氏全豹。这算第二手材料。唐修《晋书》中的李特等人载记，算是二、三手材料，仍是很有价值的。明人屠乔孙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记类”）却没有新内容。南朝李膺、任豫各著的《益州记》也在宋以后散失。《水经注》和唐、宋时期的地理书中有关成·汉史料算是凤毛麟角。这方面的考古材料，则更为缺乏，但已露出新的前景。一九七二年，在成都市内发现有“玉恒三年”题记的砖和少数民族人像的陶俑。成都市东郊也出土有相同的陶俑。玉恒是大成皇帝李期的年号，止有三年（公元三三五——三三七年）。据此，可以肯定是成·汉时期的墓葬。总之，目前能够看到成·汉史的资料不多，成·汉史的研究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

清人在研究“十六国”史方面作过重要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可能由于史料缺乏，“文献不足徵”，近人治成·汉史的很少。解放后，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成·汉史的研究重视了，新著的中国通史都有论述，还有专篇论文探讨李特及李流领导流民起兵的性质、范长生与李雄据蜀的关系、賨人是不是廪君蛮的后裔、李寿引僚人入蜀、《华阳国志》研究等方面，都是可喜的成绩；而没有系统叙述成·汉史的专书，则是美中不足的事。

成·汉政权是以賨人李氏为首建立起来的。賨人是祖国民

族大家庭在古代的一位成员，她为祖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是不应该遗忘的。古代人民开拓四川之功不可磨灭。或者说:“西土险固，襟带易守，世乱先违，道治后服。”或者说“蜀人乐祸贪乱。”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全面考察四川历史发展规律与特点，或为这种总结与考察提供一点素材等，都有必要对成·汉史进行研究。这本书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而作的。

# 目　　录

第一章　古老的賨人……1
第二章　流民入蜀及其同益州官吏的斗争……9
一　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与流民入蜀……9
二　赵廞叛乱与流民武装……13
三　李特率流民平定赵廞之乱……18
四　流民同罗尚集团的斗争……22
第三章　李特领导流民起兵……26
一　赤祖结营与流民建政……26
二　流民起兵与“约法三章”……28
三　“三道攻特”及其被粉碎……30
四　宁州少数民族的响应……33
第四章　大成政权的建立……35
一　李特建号……35
二　李流领导流民军继续战斗……37
三　流民军的重大胜利……38
第五章　李雄统治时期大成国的发展……41
一　李雄称王即帝位……41

二　　全盘汉化的封建政权机构……………………………44
三　　奠定疆域………………………………………………48
四　　经济成就………………………………………………54
五　　文化建设………………………………………………61
第六章　汉国的衰落…………………………………………64
一　　李氏皇族的内讧………………………………………64
二　　暴政……………………………………………………69
三　　桓温灭汉………………………………………………71
第七章　成·汉政权存在的历史条件…………………………76
一　　八王之乱导致分裂……………………………………76
二　　南北起义反晋　西晋无力西顾益州…………………80
三　　东晋初叛乱屡起　无法调兵伐成……………………87
四　　大成施政措施与四川地理环境的作用………………91

附　　录
成·汉大事记…………………………………………………108

# 第一章　古老的賨人

賨人是居住在秦代巴郡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散布在阆中的渝水[2]左右。不知她在什么时候建立了賨国[3]，宕渠（治今渠县）成为她的活动中心。她的祖先可能是《牧誓》八国中的彭人[4]。战国时期，住在夷水[5]下游的廪君蛮进入巴子国，成为巴子国的居民，后来逐渐融合于巴人之中。进入巴子国的廪君蛮，有的住在宣汉一带（即现在的达县地区）[6]，与賨人毗邻。后来有人认为賨人是廪君蛮的后裔，如何法盛的《晋中兴书》说："賨者，廪君之苗裔也"（《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八引、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唐人修《晋书》都采用了这一说法，近年还有持这种意见的，实在是一大误会。关于廪君蛮的传说，早已见于《世本》[7]，《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综合《世本》所记，兹移录于下：

>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锺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欢。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

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辄暮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廪君的远古传说，好象近于怪诞，难于取信。郦道元说：“事既宏古，难为明徵”（《水经注·夷水篇》），以为很难明辩。刘知几认为“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史通·内篇·书事》），则完全否定。但是，我们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洗掉它的神话色彩，便显现出廪君蛮的远古史影。

第一，传说中的巴氏等五姓，巴氏的务相为君，其余四姓为臣。而君没有君权，臣没有臣节，没有超于五姓之上的权力机构——国家。其社会组织与近代或现代还处在原始社会状态的民族相同。所以，廪君蛮是一个由五个氏族组成的部落。

第二，部落的首领是由氏族成员公推的。他们都是才能出众，在部落内享有崇高威信的人，如汉族历史中传说的尧、舜、禹。廪君蛮的五姓在‘未有君长”的时候，“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土船“能浮”者为廪君；务相都能作到，便“奉以为君”。“奉”就是公推的意思，丝毫没有权力世袭的痕迹。

第三，廪君部落在夷水上飘游，过着渔猎生活。五姓都

有土船，土船是绝对不能浮行水面的，但可以理解为他们有制造和使用船的技能。五姓在争为廪君时，“掷剑于石穴”。掷剑即渔猎的人在谋取生活资料时所用的投枪。务相能射盐水女神，就有弓矢。船、投枪、弓矢一类东西，既是武器又是生产工具，正为渔猎者所必需。廪君五姓所过的盐水，又是鱼盐所出的地方，有丰富的食物可供猎取，盐又为食鱼民族必不可少。这又为渔猎经济提供了自然条件。

第四，廪君从武落锺离山[8]迁徙到盐阳（夷水北边某地，今不可确指），遇到“盐水女神”，她们要求廪君部落停止前进，留下共居。这群“盐水女神”便是盐阳地方的处在母系社会的氏族，即在夷水流域生活的初民。

从以上四点看，廪君蛮过着原始人生活，与原始社会情景相符，完全可信，毫不诡诞。

第五，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并以人祭祀白虎；这是廪君蛮尊崇白虎的表现。白虎[9]是虎的白变现象产生的一种纯白的虎。因为白虎是极罕见的虎，故廪君蛮把白虎视为神物，尊为族徽，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图腾。

综上所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1. 廪君蛮与賨人活动的地域不同，前者在盐水（今湖北省的清江）流域，后者早于廪君入四川之前就在宕渠（今渠县）及其邻近地区（今川东北）生息。2. 廪君以白虎为图腾，賨人则要射杀白虎。如果賨人是廪君的后裔，賨人何敢仇视本族的族徽？美洲印第安人是非常尊重自己的族徽的。摩尔根叙述说：“通美洲土著间，所有氏族命名的方法都是采取动物或无生物的名称，决没有采取个人名称的。……例如新墨西哥的摩其村印第安人，氏族中

的成员声称他们是从那作为氏族名称的动物所传下来的——他们的远祖是被主宰之神将其动物变成人形的。阿吉布洼部落的鹤氏族也有同样的传说。有一些部落中，氏族成员不吃他们氏族名称的动物，这无疑地是受了此种传说的影响的”（《古代社会》第一册，一三九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二年四月版）。3. 在东汉末年，巴与賨的区别还是清楚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所以，賨人与廪君不同族。宋人罗泌已经指出过：賨人为“廪君后，非”（《路史·国名记》）。

賨人，在秦时称为夷[10]；賨人的称呼，可能开始于汉代。汉初，賨族人民“岁入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焉”（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引文据四部备要本，下同）。

賨人素称“剽勇”，是一个善于射猎的民族。人们亲昵的称呼他们为弜头白虎复夷或弜头虎子。弜[11]，两张弓重在一起，即“重弓”，强硬的意思。所以，弜头白虎复夷、弜头虎子这类名号正表明賨人善于射猎。他们使用的这种弜射程远。他们使用的箭叫白竹弩。他们使用的盾叫做板楯，用木板制成，颇为别致，因而板楯又成了賨人的标帜，故又以板楯作族名。虽然，賨人已经定居农耕[12]，而汉初“专以射白（顾校：衍——引者）虎为事”（《华阳国志·巴志》），即是说，狩猎仍然还是他们生活资料来源的补充和爱好。

賨人的活动范围，逐渐超出了原来居住的地区。秦、汉时，賨人兄弟时常到汉族地区活动。

秦昭王时（公元前三〇六年——公元前二五一年），有一

只白虎带领一群老虎在巴、蜀，汉中几郡的地面上逞凶，先后咬死一千二百人，为几郡一大祸害。于是秦昭王张出榜文，悬重赏招募勇士：有能射杀得虎者，封邑万家，赏赐金帛。賨人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挺身而出，承担起为数郡除害的重任。首先从侦察白虎的行踪入手，然后在高高的楼上，安置射杀力很强的白竹弩，待虎出来时，便对准它的头额着力射出，一箭命中，箭杆钻入三个竹节；白虎疼痛万分，凶性大发，搏杀群虎，大吼而死。于是虎灾消除。賨人廖仲药等为人民立了大功。

秦末农民战争推翻秦王朝后，项羽分封了十八王，他自己为西楚霸工。封刘邦为汉王，驻汉中。刘邦很不满意。阆中人范目[13]劝他募集勇猛善战的賨人，去攻打关中。刘邦接受了范目的建议，平定了关中[14]。賨人思乡，不愿继续跟随刘邦出关；因賨人有功，刘邦难违他们的意愿，同意賨人还乡，封范目为侯，对賨族七姓免除赋役，一般賨民每年也只向封建国家缴纳口钱四十文。

东汉之世，羌人屡次入汉中搔扰，官兵得到賨人的助力，才取得胜利。“天性劲勇”的賨人多次打败羌人，故羌人称他们为“神兵”(《华阳国志 · 巴志》) 賨人对东汉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賨民的遭遇却是悲惨的。“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箠楚降于囚虏”，以至嫁妻卖子，都凑不足赋役的费用，逼着自杀。或者賨民有冤屈，向州郡长官陈述，州牧、郡守不予受理，“含怨呼天，叩心穷谷”的事，比比皆是。賨民“愁于赋役，困乎刑酷”，简直没有生路，只有起义，才能求得生存。因此，爆发过几次賨人起义。

灵帝光和二年（公元一七九年）的一次賨人起义，反对东汉暴政，“攻害三蜀[15]、汉中，州郡连年苦之。”朝廷打算派大军镇压。后来接受了益州计曹掾程包的建议“任之州郡”，“遣太守曹谦宣诏降赦，一朝清戢”（以上引文均见《华阳国志·巴志》）。可能就在此时汉朝封了賨人的头领为賨邑侯。

东汉末年，巴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五斗米道在汉中、巴郡、涪陵一带传开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成了五斗米道的信徒。劳动人民在苦难的生活中，寻求精神安慰，便是宗教得以传播的市场。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页）。张鲁占据汉中时继续传布五斗米道，信道的人很多，賨人也“敬信”它，成为虔诚的奉道者。原住在宕渠的賨人李虎就是这时迁往汉中的。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曹操攻破张鲁之后，“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重庆市博物馆藏有羊纽方寸金印一枚，汉篆阴文：“汉归义賨邑侯”。来附与归义的涵义相同，或许这方金印就是杜濩举賨民“来附”而受封所颁发的印章。賨邑侯“来附”时，賨人李虎率领五百家投归曹操，曹操拜李虎为将军，迁于略阳临渭（治今甘肃清水县南），号称巴氐。

賨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在汉初，賨人中还流行一

种歌舞，叫《巴渝舞》。这种歌舞，汉高祖称为“武王伐纣之歌”(《华阳国志·巴志》)它的歌辞就是用賨语谱写的。《晋书·乐志》说：“……其（指賨人——引者）俗喜舞，(汉)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乐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可能由于賨人与汉人邻居，又时常来往汉区，到魏初已不说賨语，故歌辞内容也无人懂得了。

賨人是一个接受汉文化相当深的民族。据东汉末年的应劭说：战国的鹖冠子是賨人；他著的《鹖冠子》[16]杂黄老刑名各家思想，其中每有“奇言奥旨”(陆佃语)。就以李虎的后代而论，他们中有许多都在魏晋政府里做官，这就要求具有起码的阅览汉文诏令文书的能力，否则，是不能胜任的。例如李雄、李班叔侄的汉文学修养就相当高。李雄已经即帝位，凉州的张骏遣使带上他的书信到大成劝李雄去皇帝称号，向东晋称臣。李雄回信说“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于斯莫大。”(《晋书·李雄载记》)

《晋书·李班载记》说：“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自何点、李钊，班皆师之；又引名士王嘏及寞融、天水文隗等以为宾友。每谓融等曰：‘观周景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登，文章鉴知，超然卓绝，未尝不有愧色。何古贤之高朗，后人之

莫逮也!”

李雄、李班对于汉文典籍、前代史事如此熟悉，深有研究，命笔对话，斐然成章。相传梓潼县七曲山有李雄读书台（见嘉庆《绵州志·古迹》）想来不会是后人附益的。

# 第二章　流民入蜀及其同益州官吏的斗争

## 一　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与流民入蜀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住在西北边区的少数民族，从汉、魏以来陆续内迁到并、雍、秦、凉各州，与汉族人民共同生活劳动。西晋时，关中的人口有百余万，氐、羌就占了一半。他们对关中地区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西晋统治者对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采用压迫政策，当地的地主又歧视他们，长年累月，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西晋官僚江统已经看出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士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载《徙戎论》)。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晋武帝时的待御史郭钦早就耽心“百年之后有风尘之惊”；一旦有事，少数民族的骑兵从平阳（郡治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北)、上党（郡治潞县，今山西潞城东北）出发，不要三天功夫，就可以到达洛阳东北的孟津；北地（郡治泥阳，今陕西省耀县南)、西河（郡治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县)、太原（郡治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南)、冯翊

（治临晋，今陕西省大荔县）、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东）等郡的土地都将会成为“狄庭”（《晋书·四夷传》）虽然，郭钦、江统站在世族地主与大汉族主义立场说话，但的确也反映了西晋统治下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

首先起义反抗西晋统治的是匈奴人。元康四年（公元二九四年）五月，郝散起义，攻上党杀长吏，揭开了少数民族反晋的序幕。不久，郝散入关中。八月，郝散率众投降，冯翊都尉把他杀了。那里的少数民族更为愤慨，加深了已经严重的民族矛盾。

关中是一个民族复杂的地区，它在地理位置上有极为重要的军事价值，所以西晋朝廷一直派亲王镇守。但是，那些镇守关中的亲王，进不邀功，退不畏罪，为所欲为，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惠帝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九月，以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司马伦不但不从中吸取教训，改善民族关系，反而与亲信孙秀胡作非为，于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诛羌大酋数十人[17]，使少数民族头人弯弓报怨。同年夏，郝散弟度元率领冯翊、北地的马兰羌、卢水胡起义。秦、雍二州的氐、羌全部加入了起义队伍，拥众数十万，共推氐人齐万年为帝，屡次打败官兵。西晋朝廷出动大军镇压，氐、羌、卢水等族的起义者在刽子手们的屠刀下倒在血泊里。西晋官兵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屠杀，激起了起义者满腔怒火，又反转来报之屠杀[18]。镇压与反镇压的战争持续两年多，波及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六郡。至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正月，西晋官兵大败齐万年于中亭川（在扶风美阳境），俘虏了齐万年，声势浩大的关中少数民族起义

被镇压下去了。“旧社会还能够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抛在一边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Ⅱ卷第 398 页）。

西北氐、羌、卢水等少数民族的起义反晋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饥荒和疾病发生了。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冬天，“关中饥、大疫”（《晋书·惠帝纪》）；七年秋七月，“雍、梁疫；大旱、郧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同上）。人民简直无法在本地继续生存下去，只好向外地流散。关中遇到饥疫，往蜀汉就食，是一条老路[19]。元康八年（公元二九八）正月，“诏发仓廪，振雍州饥人”（同上）。待诏令颁发到雍州时，而“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华阳国志·大同志》）。这便开始了西晋末年的人民大流徙。

六郡人民的流徙开始是自发的，抱着逃死的心情踏上谁也不知目的地的漫长征途。流民所过之处的无法生存的贫苦大众自然就加入这个集体。于是，流民队伍如象裹雪球一样越裹越大，天长日久，形成了一支十余万人的流民大军。他们日复一日地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饥渴劳顿，不免疾病颠仆，“有饥病者（李）庠营护隐恤，振施穷乏”（《晋书·李特载记附李庠》），李庠等人自然而然便成为流民的‘行主”。他们于同年（公元二九八年）抵达汉中。

汉中是富庶之地。《华阳国志·汉中志》上称“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但是，流民人数太多，汉中一郡难以供给；流民们便向朝廷上书，要求“寄食巴蜀”(《晋书·李特载记》)。西晋朝廷拒绝流民的请求，派侍御史李苾往汉中“慰劳”流民，实际上是观察流民情况，阻止流民进入益州的北大门剑阁。但是，流民们凭经验知道西晋官员大多贪赃枉法，可以用金收买；于是便向李苾行贿，以期得到通融。李苾接受了流民的贿赂，便向朝廷上书说：

> “流民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从之。”(《晋书·李特载记》)

朝廷同意李苾的建议，允许流民进入益州[20]。于是，流民群众除一小部分留在汉中以外，大部分向益州进发。

流民从汉中入益州，取道川北，必须通过剑阁。剑阁即后世的剑门关，在今剑阁县东北六十里的大剑山脚下。大剑山西北有小剑山，大、小剑山都是自东北向西南走向，长达70余公里，峰峦联络，延亘如城；连绵七十二峰，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形似剑门。诸葛武侯蜀相于此立剑门，姜维退屯于此以拒钟会。西晋张载《剑阁铭》说“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宋黄裳《修关论议》说：“剑阁，蜀之金城，崇墉两崖，其高切云……中出栈道，行者侧足；虽有百万之众，安所用之。”《晋书·李特载记》说：“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至剑阁，箕踞太息，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缚于人，岂非庸才邪！’……同移者阎式、赵肃、李远、任回咸叹异之。”李特的慨叹，是他想凭着剑阁天险割据

益州称王思想的流露；并且引起了阎式等人的共鸣，足见流民上层有许多人在此时产生了割据益州称霸蜀中的念头。可以说，这是他们的思想酝酿阶段。

十余万流民，大部分进入益州，主要分散在广汉、蜀、犍为三郡，为当地的地主佣耕，或者开荒种地[21]，逐渐安定下来，总算逃脱了饿殍或转死沟壑的命运。李特欲称霸一方的美梦只好沉入心底。

## 二　赵廞叛乱与流民武装

西晋朝廷曾在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秦、雍二州的氐、羌人民大起义时又恢复梁、益二州为重州，迁益州刺史粟凯为梁州刺史，加材官将军；迁扬烈将军赵廞为益州刺史，加折冲将军。刺史加将军头衔，州内有军事活动，就可以指挥军队。梁、益二州刚恢复为重州，马上就征调二州的军队和粮食协助镇压关中起义的氐、羌。元康九年，官军在屡败之后，花了很大力量，把这次起义镇压了下去，但是，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顾不得认真处理民族关系，仍然热衷于争夺权位斗争；贾后捏造罪证，废黜太子。太子既废，群情愤怒，继而杀了太子。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四月，赵王伦以贾后等杀太子的罪名，废了贾后，“诏尚书收捕贾后亲党”（《通鉴·晋纪》），同时诛杀在朝廷中有威望的大臣，与司马伦、孙秀有宿怨的人都被杀戮，站在司马伦一边的文武官员封侯的就有几千。贾后专政换成赵王伦专政。

身为益州刺史加折冲将军的赵廞，字叔和，原籍巴西安

汉（治今南充市北），“祖世随张鲁内移，家赵，赵王伦器之，历长安令，天门、武陵太守”（《华阳国志·大同志》）；这时眼见西晋朝廷一片混乱，将会丧失控制全国的能力，正是自己摆脱朝廷羁绊的好时机，便“阴怀异志”，认定“蜀土四塞，可以自安”（《华阳国志·大同志》）。但是他自已能够控制的军队力量单薄，而且西夷校尉才是益州军队的直接掌握者，成都少城[22]又是蜀郡太守的治所，州郡咫尺，一举一动都难逃过其他官员的眼睛；想在成都扩大军队也很不容易，既不为朝廷所允许而又无兵源。正是在这个时候，六郡流民涌入川西平原。‘潜有刘氏割据之志”的赵廞便认为给自已扩充军队创造了条件，立即“倾仓廪，振施流人，以收众心”（《晋书·李特载记》）；进而指使在流人中有威望的李庠把流民中的许多勇壮组织成部曲。

《晋书·李特载记附李庠》云：“李庠至蜀，赵廞深器之，与论兵法，无不称善，每谓所亲曰：‘李玄序（李庠字玄序——引者）盖一时之关张也。’及将有异志，委之以心膂之任，乃表庠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勇壮，至万余人。”《晋书·李流载记》云：“廞之使庠合部众也，流亦招乡里子弟，得数千人。”这支一万几千人的部曲组织起来了。这种部曲就是武装部队，它又与封建国家的正规军队有区别，但它总归是武装了的壮丁。本来地方官无权建立武装，所以，赵廞任命李庠为部曲督曾经向朝廷上表呈请，经朝廷同意，才算取得合法手续。

这支武装刚组织起来，赵廞就调它去汶山对羌人作战[23]。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强，很快把羌胡械斗平定了。“（李庠）以讨叛羌功，表庠为威寇将军，假赤幢曲盖，封阳泉亭侯，

赐钱百万，马五十匹”(《晋书·李特载记附李庠》)。这次战斗，从益州政府方而来说，则完全是站在西晋朝廷一边，为保卫中央皇权而战。

从上面所举事实，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支一万几千人的流民武装，首先是在益州刺史赵廞授意下通过流民上层、旧日官吏、李氏兄弟组织起来的。其次，其成员是青一色的六郡壮勇。再次，是由赵廞表请，经过朝廷批准的，赵廞可以调动，是赵廞手中的工具。赵廞怀乱未发，当然是西晋中央皇权在益州的代表；这支新建的流民武装是封建世族地主的军队，其职能是保卫朝廷权益，镇压一切违反封建秩序的人。

赵廞对流民上层与壮勇有特殊感情，随后又在他们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六郡流民依靠赵廞作后台，社会地位顿然改观，其中一些人“专为盗贼”，危害当地人民。这一切都被蜀郡太守耿滕[24]看在眼里，耿滕把这些情况几次秘密报告朝廷。如《华阳国志·大同志》说：“滕数密表：流民刚戆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饶，宜移还本土。不者，与东三郡隘地[25]，观其情态，渐不可长，将移秦、雍之祸于梁、益矣。又云：仓廪虚竭，无以应锋镝之急，必益圣朝西顾之忧。”西晋朝廷听到耿滕反映的重要情况，不能不联想到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刚被镇压下去，若“移秦、雍之祸于梁、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对于赵廞眼前的所作所为岂能听之任之，养痈贻患？于是，来了个调虎离山。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调赵廞为大长秋，山成都内史耿滕接替赵廞益州刺史职任。诏书下到益州，赵廞拒绝接受征代；按封建社会的法律，

赵廞已构成谋反之罪。于是益州府文武士千余人前往少城迎接新刺史耿滕，由于赵廞没有离开刺史府衙，耿滕只好仍住内史衙门。

赵廞为什么在徵代之际立即拉开了反旗呢？《华阳国志》和《晋书》都没有指出原因。《通鉴·晋纪》说："廞，贾后之姻亲也。闻征，甚惧。"赵王伦废贾后，立即"收捕贾氏亲党"，赵廞长子赵昺在洛阳被杀，当是以贾氏姻亲被连诛。赵廞听到朝廷征召自己就如闻晴天霹雳，不仅惊破了割据益州称王的美梦，而且因与贾氏有亲戚关系，一到洛阳便无活命；所以拒代。而另一方面是他阴怀异志，欲割据益州称王，把流民部曲作为自己实力的支柱，可是耿滕为朝廷打算，主张把流民"移还本土"，并曾在上奏中揭露了赵廞的阴私，这是赵、耿矛盾的根源和旧仇。赵廞离开益州刺史的荣职去洛阳就任大长秋，实是俯首受戮走向鬼域；而空出的益州刺史阙位，又恰恰是由耿滕继任，这就使赵产生了新恨。旧仇与新恨交集，导致赵、耿争夺州府的殊死斗争。

赵廞为了逃避朝廷的惩罚而达到据地称王于益州的目的，必须排斥耿滕，消灭对手，首先使用武力。《华阳国志·大同志》说："廞募（李）庠党罗安、王利等劫滕，大败于广汉宣化亭，杀传诏者[26]。赵廞劫取耿滕没有成功，耿滕一时又表现得坚决，打算进入州城接任，武装强迫移交。蜀郡功曹陈恂见势不妙，极力阻止耿滕在那样不利的时刻进入大城。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今州郡并治兵，怨构日深，合村保以备秦氏；陈西夷行至，且观其变。不尔，可退住犍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陈恂对形势的这番分析是从双方实力出发的。所

说的“秦氏”属于赵廞一边，赵的实力胜过耿，所以劝耿滕不要忙于进入州府，暂住内史衙门，把蜀郡诸县的地主村保组织起来对付“秦氏”，待“秦氏”被村保力量缠住，赵廞就不敢动了，然后再从长计议；要不然，耿滕就退出成都。但是，耿滕不采纳陈恂的正确意见，急急忙忙要进大城；十二月率领军队登大城西门，两军交战，死于战斗中。赵廞消灭了第一个与他争州的对手耿滕。

此时，新任西夷校尉陈总已经在赴任途中。所以，赵廞认为若果陈总来掌握了兵权，必然对自己不利；于是派出军队截击陈总。陈总也象耿滕一样的固执，不听主簿赵模的意见，而且是个庸才，竟没看出赵廞与耿滕的矛盾是西晋司马氏中央政权与封建地方割据的矛盾，却很天真地认为他与赵廞没有矛盾，不作应急准备，结果被赵廞派出截击的军队杀于南安鱼涪津[27]（在今夹江县西）。

赵廞战胜了同他争州的对手之后，据地自雄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他在惠帝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十二月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占据成都反叛。

《晋书·惠帝纪》说：“（永康元年）十二月，益州刺史赵廞与略阳流人李庠害成都内史耿胜（即耿滕——引者）、犍为太守李密[28]、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陈总，据成都反。”据此，李庠和他所组织的流民武装在赵晰叛乱中是很重要的力量。李庠和流民武装也扮演了叛乱分子这样的角色。流民上层份子及他们所控制的部曲——流民武装完全与赵廞合流了。

赵廞称牧，立即组织新政府，任命一批官员，搭起了州牧政府的架子。《华阳国志》列举名单如下：“廞自称大〔都督〕、

大将军、益州牧，以武阳令蜀郡杜淑、别驾张粲、巴西张龟、西夷司马袭尼、江原令犍为费远等为左右长史、司马、参军，徙犍为太守李庠为威寇将军、召临邛令涪陵许弇为牙门将。召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广汉太守张微[29]、汶山太守杨邠、成都令费立为军祭酒；庠与兄〔特〕、弟流、骧、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风李攀、始平费他、氐符成、隗伯、董胜等四千骑在北门，使庠断北道。俨然一位据地自雄的益州牧粉墨登场了。

## 三　李特率流民平定赵廞之乱

益州牧政府的班底安排停当，赵廞马上派李庠带领四千骑兵断北道，防备西晋朝廷的讨伐。李庠等流民上层完全投入赵廞怀抱，准备同赵廞一道与西晋朝廷干到底；但这只是李庠等少数流民上层的一厢情愿。

李庠是李氏兄弟中最有才能的人。他才兼文武，勇猛善战，在流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在平羌与赵廞叛乱中壮大了军事力最并提高了政治地位，加上他是一位少数民族将领，这一切引起了赵廞及其僚佐的不安与嫉妒。赵廞产生了杀李庠的念头，但又不好说出口。赵廞的长史杜椒等人看透了赵廞“欲杀之而未言”的隐衷，便乘机挑拨，甚至不惜挑拨民族矛盾，就用鹦鹉学舌一般地叫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激怒赵廞。事情也巧，赵廞一伙正在议论的时候，李庠求见。李庠一往情深，满以为流民上层人士同赵廞亲密无间，同打江山，共享荣华，趁机试探赵廞意旨说：“今中国大乱，无复纲

维，晋室当不可复兴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区宇，汤武之事，实在于今。宜应天时，顺人心，拯百姓于涂炭，使物情知所归，则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晋书·李特载记附李庠》）赵廞正想杀李庠而苦于没有依据，正好把李庠的劝进作为口实，以“非人臣所宜言”这条罪状把李庠杀了；同时杀李氏宗族子侄三十余人[30]。流民受到强烈的震惊。

李庠被杀的当晚，“特、流澈(撤）众归绵竹（治今德阳黄许镇)。廞遣故阴平令张衡、升迁费恕就绥纳，皆为特所杀。”(《华阳国志·大同志》）至此李赵关系急剧恶化。此事发生在惠帝永宁元年（公元三〇一年）正月。

赵廞既然打出了反旗，当然为西晋朝廷所不容，就不得不提防朝廷的讨伐，不得不防备李庠的余部——李特、李流这支对立的力量。于是，派长史费远、犍为太守李苾、督护常俊督万余人断北道，驻扎在绵竹之石亭[31]。赵廞驻扎在石亭的军队，首先是对准李特的。李特岂能坐以待毙？立即收合余众七千多人[32]抢先主动进攻，夜袭费远，费军大溃；李特乘势纵火，费远的军队死亡了十分之七八。李特率兵直指成都，兵临城下，赵廞惊惶失措，赵的部下如李苾、张徵等人，不顾一切，冲破关卡，连夜出逃。赵廞只得与妻子乘小船从府河往下游逃命，行到广都（治今双流县中心镇东)，被下人朱竺所杀。

李特率流民进入成都，纵兵大掠，“多所枉没”(《华阳国志·大同志》)；同时，杀了赵廞任命的一些官吏。赵廞之乱平定了。李特以平叛者的身份派牙门王角、李基到洛阳陈述赵廞的罪状。这意味着李特李流等流民上层人士与赵廞划清了

界线，是朝廷的有功之臣。

赵廞叛乱，惟时甚短。从元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十二月据成都反，到永宁元年（公元三〇一年）正月“略阳流人李特杀赵廞，传首京师”（«晋书·惠帝纪»），最多只有两个月。

赵廞反叛，宿谋有年，欲效刘备据益州称帝，与李庠论兵法，便许李庠为“一时之关、张”，实以刘备自况。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依靠赵李合流，梦想居然变成了短暂的现实。可是，没有群众基础，与刘备入蜀的情况不同：这时的益州居民尚思安居乐业，不支持这个野心家割据独立，如梁州刺史罗尚所指出的：“蜀人不愿为乱，必无同者”（«华阳国志·大同志»）。与刘备入益州时的情况是：刘璋懦弱，张鲁在汉中，巴西太守庞羲屯驻阆中防御张鲁，因增兵而被谗；“东州兵[33]任意侵害益州百姓，百姓怨恨；刘璋“政令多阙”，百姓更为不满；益州大吏赵韪利用百姓不满刘璋的情绪，联合大地主起兵反对刘璋，刘璋依靠“东州兵”击败了赵韪，但各地主集团间的矛盾并没有缓和；张松、法正等益州官吏，“忖璋不足以有为”（«三国志·蜀志·法正传»），竭力主张援引军阀中名声很大、实力不强的刘备入蜀，刘璋本人于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听到曹操将遣锺繇讨张鲁的消息，便遣法正到荆州迎接刘备。可能赵廞意识到自己没有刘备那时那样的有利条件，得不到蜀中地主的支持，就只有依靠入蜀流民的上层分子及勇壮。于是主动结成赵李联合。但这个联合是松散的，不但没有共同的基础，而且双方都有据益州称王的打算。只不过，李特等人虽有那样的思想，但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还要仰仗赵廞，赵廞也要借助流民，相互为用。赵廞想利用流民作为实力支柱，也

就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李庠在赵廞卵翼下组成一支万多人的部曲武装，在平定汶山羌人械斗中显示出他的才能，被朝廷封为亭侯，提高了政治威望；并且有散布在梁、益而比较集中在三蜀的十多万六郡流民作为后备力量。赵廞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自称益州牧后，便把李庠从犍为太守迁为威寇将军，调去断北道，以防御西晋朝廷征讨，这是对李庠的依靠。

此时，西晋执政者赵王伦正在篡夺帝位，并忙于巩固篡得的帝位，无暇讨伐赵廞反叛之罪，赵廞则以为自己益州牧地位已经安稳，转而思之，便对李庠很不放心；因为李庠掌握着益州重兵，无论李庠归顺朝廷或拥兵自立都可以取代益州牧地位，于是急于要杀李庠。而益州长史杜淑、司马张粲便乘机煽风点火对赵廞说："《传》曰，五大不在边[34]，将军起兵始尔，便遣李庠握强兵在外，愚窃惑焉。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倒戈授人，窃以为不可，愿将军图之"（《晋书·李特载记》）。赵廞根本没有战胜李庠的武装力量，借口李庠进"非人臣所宜言"而把李庠杀了，致使赵李联合马上破裂，赵廞为自己敲响了丧钟，加之蜀人不支持叛乱，所以未待朝廷发兵征讨，赵廞就灭亡了。

"赵倡祸阶，乱是用长"（《华阳国志·序志》）。常璩这样评论赵廞之乱，就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发展说是正确的。西晋末年，封建统治集团内的高级官僚起来脱离朝廷，赵廞叛乱为第一个，所以说"赵倡乱阶"。平定赵廞叛乱的力量，又是赵廞为了叛乱而一手扶植起来的流民武装。这支流民武装把赵廞消灭后，又在反对罗尚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经过整整三年时间公开的武装斗争，建立了大成政权，李雄称王、称帝，另

立朝廷，与司马氏政权处于对等地位，一直维持了四十多年，岂不是“乱是用长”吗?

## 四　流民同罗尚集团的斗争

赵廞之乱平定后，西晋朝廷马上任命罗尚为平西将军、假节、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带领一支一万多人的武装部队入蜀上任[35]。

罗尚，襄阳人。祖父罗蒙，为蜀汉的广汉太守；父亲罗式，牂柯太守；叔父罗宪，巴东太守。罗尚曾为建威将军王戎的参军，参加平吴战争；元康末，为梁州刺史。为人性贪，少断。下有悍将，不能控驭。新到益州，面临的十多万流民便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罗尚率重兵赴任，显然，对流民军是个不祥之兆，也完全出乎李特等人意料之外。流民从而产生恐惧心理。李特为了缓和与罗尚的关系，便派他的弟弟李骧在道旁迎接，贡献宝物。罗尚贪财好利，受了贿，很高兴，就用李骧当骑督[36]当罗尚路过绵竹时，李特、李流亲自办起牛酒犒劳。永宁元年（公元三〇一年）三月，罗尚到达成都。

秦、雍二州的人口大量流徙，一些地方官吏也随着流民远走他乡。扶风、始平、天水、略阳、武都、阴平等六郡共有户六万四千八百二十二（《晋书·地理志》)。这次迁徙的有数万家十余万口，大约占了六郡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出走的丁壮多，留下的主要是老弱，农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六郡顿时荒凉。西晋朝廷自然无法从六郡征发赋税和徭役，无

异失去对二州的统治；所以尽量设法遣返流民。秦、雍二州政府按朝廷旨意把留在汉中的流民万余家送回原郡去了。分散在益州的六郡流民当然在遣返之列。这一消息传到略阳，李特的大哥李辅感到不妙，而且看到黄河流域已经拉开了大乱的序幕，大战的场面必将演出；到那时，略阳会是什么情景？为了把黄河流域的情况告诉在益州的弟弟，劝阻他不要回洛阳，李辅便从略阳出发赶到益州，对李特说“中国方乱，不足复还”(《晋书·李特载记》)。李特认为李辅的意见很对，“乃有雄据巴蜀之意”(同上)。即是说，这时李特下定决心据巴蜀称王。

西晋朝廷为了顺利地把留在益州的流民遣返原籍，采用了分化政策：对李特、李流加官晋爵，因他们讨平赵廞有功，拜李特为宣威将军，封长乐乡侯；拜李流为奋威将军，封武阳侯。又命令益州府“条列六郡流人与特协同讨廞者，将加封赏”(同上)。对流民上层加以笼络，可以减少遣返工作中的阻力。

益州府中的核心人物罗尚、辛冉、李苾等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家伙，辛冉尤为粗暴，他就反对封赏六郡流人中协助李特平定赵廞之乱有功的人；协助平乱而有功之人没有得到封赏，“众咸怨之”(同上)。这样一来，罗尚集团就得罪了流民上层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又是李特、李流依靠的骨干。如果李特、李流没有这部分人的支持就不会有功受封；如果把这部分人也当作一般流民遣返了，那么李特、李流便失去凭依，只留下一具空架子，不仅雄据巴蜀将成泡影，而且任何时候罗尚集团都可以致二李于死地。李庠的悲剧，记忆犹新。所以，遣返流民，李特等人根本不能接受。于是，李特与罗

尚围绕着流民遣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李特既有“雄据巴蜀之意”，当然不肯离开三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采用拖延启程的办法，请求延期上道，使停留合法化。当益州开始遣返流民时，李特派阎式向罗尚请求延期到秋天再走，还向罗尚、冯该“进货赂”，第一次延期得到了同意。后来，罗尚限定流民七月上道，李特又请求延期到冬天。当然，流民方面确实也有一些具体困难，如流民“随谷庸赁，一室五分”，一时集中不起来；七月正是“雨潦”季节，行进困难；“年谷未登，无以为行资”；这些都可以作为延期的理由。可是，辛冉、李苾坚决不同意，强迫上道，归还原籍。阎式又向益州别驾杜弢说“逼移利害”：“必穷鹿抵虎，但恐绳之太过，迸民不肯延颈受刃”（以上引文俱见《华阳国志·大同志》）杜弢同意延期一年。但罗尚、辛冉、李苾一伙不仅坚持不予延期，限定流民七月上道；而且还要趁流民在离开益州的途中掠夺他们的财物。辛冉、李苾对罗尚说：“流民前廞乱际，多所枉没，宜因移设关以夺取”（《华阳国志·大同志》）。固然，流民趁赵廞叛乱而“枉没”的财物是不义之财。但罗尚集团乘流民返乡移动时把关打劫，这就更暴露了罗尚集团的贪婪。七月间，罗尚通知梓潼“所在抱关”，拦劫流民。到八月间，各交通要道的关卡都搞好了。李特又派阎式去成都向罗尚请求延期。阎式从绵竹到成都，看到在交通要道上都立起了营栅，作好了袭击流民的准备。看透了罗尚、辛冉、李苾坚决与流民为敌，意不可回，便告辞归绵竹。罗尚使出狡猾阴险的伎俩，对阎式说：我已经同意延期了，您把我的意见告诉流民。阎式说：明公被奸说迷惑，恐怕不会宽期。但

您要知道，老百姓看起来没有力量，实际上不可轻视；现在，你们不考虑流民的实际困难，横不讲理地催促上道，把流民群众逼得无路可走，后果是很严重的啊！罗尚还假惺惺地说：您说的对，我真的同意延期了，不骗您，您回去吧。阎式识破了罗尚的诡计，根本不相信罗尚的甜言蜜语。罗尚手下的悍将辛冉、李苾控握强兵，又不是罗尚所能节制，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直到使用武力。此时，流民与益州双方的对峙形势已经非常紧张，好似箭在弦上。阎式回到绵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一一向李特作了汇报。阎式是李特的智囊，是流民上层中很有才干、善于应对、富有历史知识的人才。在多次与益州府官员的接触中，认识到罗尚集团与流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合的，两方必将导致武装冲突，因而向李特提出“宜深为备”的建议。这是非常正确的，及时的。九月，罗尚“遣军军绵竹，扬言种麦，实避逸越”（同上）。罗尚迫不及待要下手了。

自七月以来，在罗尚集团一步一步地逼迫下，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流民们“人人愁苦，不知所为，”纷纷投奔李特。

# 第三章　李特领导流民起兵

## 一　赤祖结营与流民建政

李特本想据蜀自雄，趁流民来附时（公元三〇一年九月），便“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人”（《晋书·李特载记》）。同时，缮甲厉兵，作战斗的准备；另一方面又写信给辛冉请求宽期。粗暴专横的辛冉非但不许宽期，反而大怒，在交通要道张榜，“购特、流首百匹，（《华阳国志·大同志》）。李特等为发动流民群众起来同益州政府作斗争，便揭下榜文，加以更改，改成：“能送六郡大姓阎、赵、任、杨、李、上官及氐叟梁、窦、符、魏、董、费等首百匹”（《晋书·李特载记》）。这样一来，激怒了全体流民。流民知道六郡大姓、氐臾侯王是他们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如果把那批人杀了，十万流民便成了散沙，个个犹如俎上肉，辛冉之流可以任意宰割，辛冉满以为这一着可以瓦解流民，结果，事与愿违，不但没有起到瓦解的作用，相反促使流民们加快团聚在李特周围，“骋马属鞬，同声云集，旬月之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同上）。十月，李特把集中的流民驻扎在绵竹之赤祖（绵竹东北，今德阳县境内），分

为东、北二营，特居北营，流居东营。刀枪林立，时刻准备抵御罗尚的武力进攻。罗尚派遣屯扎在绵竹的军队早有袭击流民军的准备。李、罗双方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

李特等流民上层人士对当时形势作了估计，认识到罗尚集团必然要诉诸武力，甚至迫在眉睫。所以，在结营的同时，他们就着手组织政权机构。《华阳国志·大同志》说：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三〇一年）“冬十月，特、流乃保赤祖为二营，特称镜北、益州，流镇东，皆大将军。兄辅骠骑，第骧骁骑，特长子荡镇军，少子雄前军，李含两夷校尉；含子国、离及任回、上官晶、李攀、费他皆将军，以天水任臧、上官惇、杨褒、杨发、杨珪、王达、曲歆，阴平李远、武都李情、略阳夕斌等参佐；而阎式、何巨、赵肃亦为宾从；其余皆有官号。”我们从这份名单中，首先看到賨人李氏兄弟子侄在军队里占据了主要地位，掌握了流民武装的领导权；其次，六郡大姓、氐叟侯王也取得一定职位，为李氏羽翼，组成了流民上层的联合政权；第三，这个政权的官称又以军职为多数，体现了它面临的军事任务，表明它具有军政府的特点；第四，这个政权的职官名称都沿用封建政府官吏的旧名，为以后政府机构的全盘汉化的根据；第五，在武装斗争展开之先，便封官建政，是这次流民起兵的一大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六郡流民上层早有据益州称王的思想。自然这个政权只是雏型，极不完备，有待于来日的补充，臻于完备。

## 二　流民起兵与“约法三章”

李特作好了一切应急的准备，严阵以待。果然，辛冉于公元三〇一年十月先下手。遣曾元、张显、刘并等偷偷摸摸领步骑三万铺天盖地而来，袭击李特的北营。罗尚也派田佐带兵前来助战。曾元的军队临营，李特安卧不动，待官军半入，李特的伏兵齐发，杀伤官军甚众，曾元、张显、田佐被流民军杀死，传首罗尚。

李特领导的流民军首战首捷，马上推锋前进，攻击在广汉郡的辛冉，围困雒城（治今广汉县北）。辛冉派遣军队出城作战，累次被打败。罗尚遣李苾，费远救助辛冉。李、费又被流民军的威力吓倒，不敢进军。辛冉智力既窘，突围逃奔江阳[37]，顺长江东下投靠荆州刺史刘弘去了。流民军占领了雒城，任命李超为广汉太守。李特挥军直指成都，兵临城下，罗尚闭城固守，同时，向梁州和宁州方面求援。

两军在成都对峙的时候，流民政权采取了一些措施，争取群众，扩大新政权的群众基础。

李特等在蜀中住了两年多，益州官吏的贪暴他们是一清二楚的，尤其是罗尚的昏庸腐朽，贪污狼藉，闻名远近。蜀人编了一首歌谣，说“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虎，无复极已，”（《华阳国志·大同志》）。益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罗尚集团的搜刮下，怨声载道。李特在探索两军对峙不下的原因时，大约回顾了同年（公元三〇一年正月）流民军平定赵廞之乱打进

成都就大肆劫掠而引起蜀人不满的教训，为了彻底击败罗尚集团，为了在益州站住脚跟，便立即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

施舍振贷的主要对象自然是劳苦大众。劳苦大众在腐朽的世族地主的剥削与压迫下，受害已深。加以赵廞“奢泰”，罗尚“贪残”，赵廞叛乱，三蜀的劳苦大众难以活命，嗷嗷待哺，急需赈济。李特这一措施是及时的。虽然施舍振贷的具休内容、范围与作法，因史料缺乏，不得其详，但无疑对劳动人民是一件好事。所以，蜀中人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

礼贤拔滞，即从地主阶级中搜罗人材，为李特服务，如范长生、杜秀、谯秀、龚壮等地主分子都是徵聘的对象。这一条，自李特起兵至成汉终世，他们都是坚持了的。

“军政肃然”，看来不象约法三章的条文，而它的涵义可以理解为整顿军纪，改革吏治。整顿军纪在当时非常必要。由于赵廞纵容，一部份“流民，恃此专为劫盗，蜀民患之。”李特、李流赶走赵廞，流民进入成都，“因大抄掠”，“多所枉没”（《华阳国志·大同志》），影响极坏，所以必须订一条以约束流民军队；这也是贯彻了的。改变了旧日的不良作风。

李特与蜀人的约法三章，第一章专为一般劳苦大众而订。李特鉴于流民问题的严重，故他对蜀中贫民特别注意，无疑会取得一定的效果。第二章是李特的组织路线的具体体现。“礼贤拔滞”就是从地主阶级中选拔官吏，争取益州地主参加政权，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扩大其政权的阶级基础，贯彻的是一条地主阶级的组织路线，这与李恃建立的军政府被六

郡大姓及氐叟侯王所控制的阶级本质是一致的。第三章，整顿军纪，不许侵掠，保持社会安宁，对社会各阶级、阶层都有好处，如果流民侵掠，必然以地主、工商业者为对象，劳苦大众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供劫掠。总的说来，李特与蜀人的约法三章，其实质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新的施政方针。

双方在成都内外对峙着。罗尚想击溃流民军，多次派兵出战，都被流民军打败。罗尚被困在大城，感到孤城难守，便撤出大城，渡过郫江，在郭江南沿建起了一道从都安（治今灌县）到犍为（治今彭山）长达七百里的水上防线，扞御流民军。罗尚撤出成都，李特也不去占领它。因为占领一座孤城，有被包围的危险。李特也把军队撤走，退保广汉的雒城。这大约是永宁元年十一、十二月的事。

## 三　“三道攻特”及其被粉碎

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年）的春天，外州援军陆续来到，官军向流民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棋的攻势。官军分三道向流民军扑来。

第一道，梓潼方面。西晋朝廷派遣衙博进攻李特，军队驻在梓潼（郡治梓潼，今梓潼县城关），李特派李荡等率兵抵御。衙博想不战取胜，派参军蒙绍去诱降，不作攻守准备。罗尚写信给衙博，督告他说：“昔年得李流笺，降心款款，由时威贴，得还为寇。闻特委诚于下吏，而流、骧七八千人来寇日至，奸凶之态，诡谲不测，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华阳国

志·大同志》)。衙博没有接受罗尚的警告。李荡出击于阳沔（在梓潼北），官军乱了手脚，不战而退。梓潼太守张演弃城逃走，巴西郡（治今阆中）丞毛植等举郡投降。

李荡追衙至汉德（属梓潼郡，县治今剑阁县东），围衙博于掌夫山。《元和志》剑州临津县下云:“掌夫山在县西南六十里。晋太安元年，遣都护衙博讨李特，特遣将李荡自掌夫山要博，博为伏兵所围，……。”

衙博败逃到葭萌（治今广县昭化东北)。五月，李荡又追到葭萌，衙博远遁，余部投降。

第二道，繁城（治今新都县新繁镇西北）方面，罗尚遣张龟从这边进攻，李特亲自对付。看来，这方面的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以流民军获胜而结束。

第三道，德阳（治今遂宁）方面。西晋朝廷起用前广汉太守张徵重为广汉太守，军队驻扎在德阳这方面的战斗，开始于李特破张龟于繁城之后。李荡全面击溃衙博之后，也来到德阳参战。

张徵依高据险，李特和李荡分为二营，两军相持了许多天，张徵侦察到李特营盘空虚，派步兵从山路来袭。李特即起还击，不利，士众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紧要关头，李荡率军来到，山路狭窄，只能容一二人通行，李荡的军队也无法前进，李荡急于援救李特，奋不顾身，对他的司马王辛说:“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晋书·李特载记》)，便穿上两层铠甲，手持长矛，大呼直前，一连杀了十几个官兵；李荡的军队紧跟前进，奋勇杀敌，官军抵挡不住，一时溃败下来。李特打算就此结束战斗，放走张徵，自己退回涪县（治今绵阳市

东)。李荡和王辛主张穷追：认为张徵的军队连续作战，士卒伤残，张徵无能为力，应该乘其弊而擒之；如果放他走了，他收合余众，加以休整，那时想去消灭他就不容易了。于是进军围张徵，张徵突围逃走，李荡率军水陆两路兼程追赶，杀徵，活捉了徵的儿子张存。流民军以蹇硕为德阳太守。

流民军粉碎了官军发动的三路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回击罗尚发动的三路进攻之前，李特预先在毗桥（今新都县南）部署了七、八千人，它的任务在于扼制官兵北上，使它不得向繁城增援，还可以保护绵竹老营。这支军队堵住了困在成都的罗尚，罗尚想拼命打出去，都被击败。一次，罗尚派几千人出战，被李骧打退；李骧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资，一直打到罗尚的营前，放一把火烧了军门。这支阻击部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完成了任务。德阳战斗结束，李流进驻成都北面，直接威胁成都。罗尚企图解脱流民军对成都的威胁，割断在成都外围的流民军与绵竹的联系，便从中间攻击在毗桥的李骧。这时，李骧军队不过两千人，罗尚派出的间谍探得实情，派遣精勇一万人，衔枚疾走，夜袭李骧。流民军失利，李攀战死。李骧与战士奔向李流营栅，并力反攻罗尚军队，尚军大乱，伤亡惨重，败回去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流民军获胜，又缴得一批器甲。

罗尚军队的几次进攻都失败了。梁州刺史许雄派出的援军也不能进入益州。李特的势力日益强盛起来。

## 四　宁州少数民族的响应

正当罗尚向流民发动三路进攻的时候，宁州少数民族头人起兵响应。

宁州是晋武帝在泰始六年（公元二七〇年）分割益州之建宁、兴古、云南和交州的永昌四郡建立的。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罢宁州，置南夷校尉，以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守，“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每夷供南夷府，入牛、金、旃、马，动以万计。……致校尉官属，其供郡、县亦然”（《华阳国志·南中志》）。这样的苛重剥削，夷人颇为“忿恚”。后来，建宁太守杜俊（《通鉴》作许俊）、朱提[38]太守雍约儒怍无治，政以贿成；杜俊夺大姓毛诜、李叡的部曲，还把毛诜的弟弟治了耐罪[39]；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干，他的弟弟为郡功曹，按规定应当察举，杜俊受了都尉雷逢的贿赂，不举李猛的弟弟而举雷逢的儿子为孝廉；杜俊所有这些不法行为，引起毛诜、李叡、李猛的怨恨。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年）秋天，李叡、毛诜驱逐建宁太守杜俊，李猛驱逐朱提太守雍约，响应李特，各有数万人。南夷校尉李毅镇压了大姓的反抗，杀了毛诜，李靓投奔遑耶[40]五苓夷帅于陵承。李猛势孤，便向李毅递了投降书，说：“生长遐荒，不达礼教，徒与李雄和光合势，虽不能营师五丈，略地渭滨，冀北断褒斜，东据永安、退考灵符，晋德长久，诚非狂夫所能干。”（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李猛在投降书中毫不隐讳他们与流民军的关系。因为南中大姓不满于李毅的苛猛，想摆脱他的统治，打算“北断褒斜，东

据永安”，与李特等人想到一起了，“和光合势”便是很自然的事。南中大姓的响应，对李特在反击官兵的战斗中起到了牵制的作用。李猛尽管递了降书，但书辞很不恭逊，对晋朝的统治能力感到怀疑，与李雄的“和光合势”却说得津津有味。李毅就把李猛杀了。这一年[41]又恢复宁州建制，除原辖四郡外，又增加牂柯、益州、朱提三郡，李毅为刺史。太安三年（公元三〇四年），李毅把李叡杀了，于陵承及曾拥戴李猛、李叡的遑耶大怒，组织起来反对李毅，“破坏郡县”，“围攻州城”。这时，李毅“病笃”，益州方面疲于与流民军战斗，更没有力量来救援，围困四年，李毅病死。

# 第四章　大成政权的建立

## 一　李特建号

在击溃官军三路进攻之后，流民军已经占领成都以北偏东的大片土地，蹇硕夺取了垫江（今合川）。成都一这座州、郡所在的重要城池，便暴露在流民军矛头之下，可计日而取。但是，罗尚建立的郫江防线还在，这对流民军是巨大威慑力量。因为如果流民军占领成都，罗尚就可以调这水上防线的军队包围成都；如果流民军南进，罗尚也可以用郫江防线阻止流民军南下；所以李特要攻取成都，又要守得住，就必先攻破罗尚的郫江防线。

《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军。特从盎底渡，党徒从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缘江。守军皆散走。”流民军攻破了郫江防线，进逼成都，晋朝的蜀郡太守举少城投降。李特扎营在少城。罗尚保有大城。李流率军驻扎在郫江的西面检江。这样的军事形势对流民军非常有利。

李特进少城，“惟取马以供军，余无侵掠。”任命李璜为蜀

郡太守，安抚民众，正式建立年号，年号建初：完全脱离西晋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中之国。

此时，罗尚处于劣势地位，罗尚遣使求和。成都附近的地主村保，也归附流民军，“特分人就主之”（《华阳国志·大同志》）。分去各村保的人都是‘勇壮”。李流、李雄认为这种作法是错误的。他们说：当时还有官兵和占山据水的反对武装没有消灭；流民军粮食缺乏，军械很少，势单力薄，应当要求州郡大姓派子弟为人质，把他们送到绵竹老营；派往村保的勇壮要全部收回，集中力量，对困在大城的罗尚严加防备；“纳降若待敌”，不可疏忽啊！李流、李雄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李特不听。

益州政府处在非常危急的时刻，眼见就要倾覆了。朝廷赶紧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率水军三万援救罗尚。宋岱以孙阜为前锋，进逼德阳。李特派李荡及蜀郡太守李璜往德阳，与太守任臧共拒孙阜。荆州军貌似强大，影响了原先靠近流民军的地主村保，他们动摇了。

李特分散壮勇，大大减低了流民军的战斗力，给对方以可乘之机。罗尚的部从事任明就看出了这一破绽。罗尚遣人缒城而出，与诸村保密约二月十日“同时讨特。”益州从事任明（或作任叡）亲自出马搞假投降。不多时，任明要求回家看望，李特还发给“启信”（即通行证），对敌人完全丧失了警惕。任明离开少城，偷偷溜到大地主控制的村保中活动。一切都布置好了，二月十日那天，各村同时发动，大杀流民兵众，连战两天，流民军因众寡不敌，大败。李特收集余众，向繁县撤退。在罗尚的追击下，李特、李辅、李远都在战斗中牺牲。流民

军受到了自起兵以来的一次重大失败。

## 二　李流领导流民军继续战斗

李特牺牲，罗尚一时得势，原来归附流民军的村保也背离而去。繁城败后，李流与李荡、李雄收合余众，退还赤祖，仍然分成二营把守，李流保东营，李荡和李雄保北营。流民群众推李流为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

荆州派采的孙阜攻破德阳，守将蹇硕被俘，太守任臧退屯涪县[42]。

三月，罗尚遣张龟、何冲、左氾等驻于繁城，待机而动；常深札军毗桥，防御流民军南攻。此时，涪县民药绅、杜阿反叛，响应罗尚。流民军踡跼于以赤祖为中心，北至涪县，南不得过毗桥，西不能窬繁城的一小块区域内，迫于三面抗御的被动局面。李荡、李雄率兵镇压涪县药绅、杜阿的反叛时，常深出击在毗桥的李骧，李军战败。当李荡、李雄到涪县镇压药绅，赤祖老营空虚，在繁城的左氾、何冲、黄訚乘虚三路攻北营。营中的氐人苻成、隗伯、石定叛变，北营受到内外夹攻。李荡的母亲罗氏，在这危急时刻，披甲出阵，虽然罗的眼睛被隗伯刺伤，而她的战斗意志更加高昂，大大鼓舞了士气。战斗从早上开始，到了中午，罗氏渐渐支持不住，北营在即将攻破的时候，恰好李流破常深，李荡、李雄破药绅回来，与左氾、黄訚遭遇，把左、黄打得大败，苻成、隗伯率众突围，投降罗尚。李流乘胜追击退兵，径抵成都。罗尚又闭城自守。在追击退军中，李荡阵亡。

李流对形势的估计是悲观的，他看到李特、李荡相继在战斗中牺牲，宋岱、孙阜的军队迫近，于是，他动摇了。李含劝他投降官兵，他居然接受了这个错误意见。李雄与李骧表示反对。李流执意派儿子到官方充当人质。

李雄、李离是堂兄弟，他们都反对投降，主张向孙阜发动进攻以扭转局势。李雄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依靠李流是不成的，只有依靠士兵。他向士兵群众说：第一，罗尚内部并不团结，互相侵削；第二，我们“共残蜀民”，投降之后，便会被人任意宰割；第三，我们只有打败孙阜才是生路，打败了孙阜，我们可以取得富贵，现在正是我们取得富贵的好机会。士兵们听了，都赞成李雄的意见。于是李雄与李离指挥流民军向孙阜军队猛攻，一鼓作气击破了它，孙军死亡惨重，宋岱在此关键时刻死了。荆州军跟即退出益州。

实践证明，李雄、李离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雄指挥军队攻罗尚，接连取得胜利，罗尚退保大城。六月，李雄杀汶山太守陈恺。七月，李雄入郫城（今郫县），李流也把他的军营迁进去，郫城成了流民发号施令的中心。

## 三　流民军的重大胜利

自从流民军与罗尚展开武装斗争，巴蜀成了长期作战地区，三蜀尤为频烦，老百姓大量向外地流亡，以致“野无烟火，卤掠无处”（《华阳国志·大同志》）。流民军的粮食供应成了严重的问题，军中饥荒。后来流民军得到范长生的支持，解决了粮荒，士气又高涨起来。

范长生，涪陵郡丹兴县人，他的先人是当地的大地主。蜀汉时，涪陵大地主徐巨谋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后，迁移那里的豪族徐、蔺、谢、范五千家到蜀郡。范长生一家就是那时迁入蜀郡的。范长生家世世代代掌握部曲，他本人又是天师道教主。到李流据郫城时，他领有千余户人家，住在青城山下。青城山是天师道的一个治所，是有名的洞天福地。《寰宇记》卷七十三引《道书福地记》说："上有没溺池，有甘露、芝草"。又引《玉匮经》说："此（指青城山——引者）第五大洞，宝山九室之天，黄帝所秦（当是奏之误——引者）拜为五岳丈人。黄帝刻石拜谒篆书犹存。又有石日月象。天师立青城治于其中。"青城治不在二十四治之中，或者是别治、游治、下治之类。天师道的治犹如世俗的官府，管理道民的宗教行政机构，组织比较严密[43]，教主与教民的关系，实际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形成一种超乎国家行政组织之外的统治力量。范长生在青城山下拥有部曲，必然也拥有道民。他能拿出粮食供军，这充分显示了他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又是一个拥有武装的道教主。罗尚平西将军府参军徐舆看中了范长生这股力量，他向罗尚要求为汶山太守，联合范长生，共同攻李流；罗尚不许。徐舆怨怒，出降李流；李流用为安西将军。徐舆，涪陵人，与范长生算是同乡。通过徐舆的游说，范长生资给流民军粮食。李流的军粮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摆脱了饥饿的困境。

九月，李流病死。李雄继续统军，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都于郫城（治今郫县城关）。

罗尚趁李流新死，李雄在郫城还没有站稳脚的时候，几

次派兵来攻。李雄将计就计，使武都人朴泰为间谍，朴泰对罗尚说：因为无粮，士兵饥饿，李骧与李雄丧失了群众，陷于孤立，相互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对方，每天都在争吵；李骧打算率领流民到郫江西面去就食，流民军内部混乱不堪。如果官兵偷袭，我为内应，一定能取胜。罗尚以为然。朴泰与罗尚约定：以发火为号，见火起，就开始攻城。罗尚遣流民军的叛徒隗伯带领人马潜来。李骧布置伏兵于道路旁边，等待官兵。到了约定的时候，朴泰递出攻城的梯子，同时发火，隗伯的军队见火光燃起，争着登梯，李雄出兵猛击，伏兵齐发，内外夹攻，隗伯兵大败，李雄追退兵直到成都城下，山呼万岁，齐喊：已经占领郫城了！李雄的军队已经进入少城，罗尚才发觉上了当，躲进大城不敢出来。

成都以北一大片土地都被流民军控制，龟缩在大城内的罗尚军队，只有靠从犍为郡（郡治武阳，今彭山）方面运输粮食补给，若切断这条粮道，可以致罗尚于死地。李骧带领一支军队攻犍为，俘虏了太守龚恢，任命李溥为新太守，卡断了罗尚的粮道。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年）闰十二月，罗尚早已断粮，困守危城，李雄抓紧战机，急攻大城，罗尚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便于夜间弃城逃走，顺牛鞞水（今沱江）东下，溜之大吉。李雄入据大城，任命严柽为蜀郡太守。

流民军赶走了罗尚，占领成都全城，李雄取得了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 第五章　李雄统治时期大成国的发展

## 一　李雄称王即帝位

李雄虽然赶走了罗尚，但得到的却是人烟稀少、满目荒凉的城池与乡村。当李雄进入郫城的时候，那里已经是“野无烟火”，三十年后，李寿即帝位，大成国的都城——成都还是“郊甸未实，都邑空虚”(郭允蹈《蜀鉴》引李膺《益州记》)。原来巴蜀的土著纷纷向荆、湘和南中流徙，永嘉五年（公元三一一年），杜弢领导的荆湘流民起义，其中就有巴蜀流民四、五万家。巴蜀人口的大量流亡，反映了巴蜀人心的向背。还在六郡流民刚进入三蜀地区的时候，蜀郡太守耿滕就看出了问题，说“流民刚戆而蜀懦弱，主客不能相饶”(《华阳国志·大同志》)。这种外来者与土著者的矛盾，既包含有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含有民族矛盾的内容。当流民初入三蜀，在赵廞的纵容下，一部分流民“专为盗贼”，进而李庠秉承赵廞旨意组成一支青一色六郡勇壮参加的部曲，正式加入赵廞集团，从流民转变成统治者，就这方面说，这种主客矛盾则属于阶级矛盾

的性质。李庠与赵廞的矛盾，杜淑们认为“非我族类”，就这方面说，则具有民族矛盾的性质。李特起兵之后，力图消除这两种矛盾，提出“约法三章”：执行“施舍赈贷”和整顿纪律，可以使劳动人民靠拢流民军；执行“礼贤拔滞”，网罗蜀中地主阶级中的人材，纳入流民政府，可以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扩大流民政权的阶级基础。李特约法三章，在顺利的情况下是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的。事实并不顺利。结果，巴蜀人口大量流亡，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年)秋天，已经有“梁、益流人猥集荆州”(《通鉴·晋纪》)。上距李特绵竹起兵还不到一年时间。很可能在太安二年二月十日，原来归附李特的许多大姓控制的“村保”反水，与罗尚一起进攻流民，流民军损失惨重，李特等战死；后来，流民军进行报复，即如李雄说的“共残蜀民”，因而巴蜀土著（包括地主和劳动人民）大量流亡。

经过李特、李流领导流民军三年为实践，李雄认识到不得蜀中土著的支持是危险的。李流通过徐舆的游说，流民军得到范长生的大力支持，使流民军度过难关，转危为安。尽管范长生原籍是涪陵丹兴，但范氏在蜀中居住已有百年，有土地，有千余家部曲，又是道教首领，与蜀人有千丝万缕联系，即是说，有相当实力。故“李雄以范长生有名德、为蜀人所重，欲迎以为君而臣之，……”(《通鉴·晋纪》）以缓和六郡流民与蜀中土著的矛盾。可是，流民武装全是六郡人，将领全是流民的上层人士——大姓、氐叟侯王、旧官吏；范长生曾经在流民军困难时期资助过，给流民军为印象是好的，而六郡流民上层人士能否接受范长生的领导，他应该清醒地考虑到这一点，于是，他充分利用披在身上的道袍，传达天

意，说什么“推步大元五行，大会甲子，祚锺于李，非吾节也”(《十六国春秋》)。范长生辞让，更劝李雄自立。李雄在流民军将领共同拥戴下，于惠帝永兴元年（公元三〇四年）十月，称成都王。他按照封建王朝的模式设置中央官吏，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

> 《华阳国志·大同志》云:“永兴元年冬十月，杨褒、杨珪共劝雄称王，遂称成都王，追尊曾祖虎曰巴郡公，祖慕陇西王，父特景王，母曰太后，追谥世父辅齐烈王，仲父庠梁武王，仲父流秦文王，兄荡广汉壮文公，以叔父骧为太傅、庶兄始为太保、外兄李国为太宰、国弟离为太尉、从弟云为司徒、璜为司空、阎式为尚书令，褒为仆射、发为侍中、洪为益州刺史、徐舆镇南、王达军师，具置百官。”

光熙元年（公元三〇六年）三月，范长生从青城山来到成都。六月，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改元宴平，以范长生为丞相，加号“四时八节天地太师”(《通鉴考异》引《华阳国志》)，封西山侯，“复其部曲，军征不预，租赋一入其家”(《华阳国志·大同志》)。这是李雄和流民上层给范长生的酬谢：政治上是丞相，当朝一品；经济上，他的部曲不负担徭役，他的土地也不向大成政权输纳租赋。他成了十足的封建贵族，既有土地，又有依附农民，还获得豁免赋役的特权。范长生从支持流民集团到加入大成政权，标帜着六郡氐叟侯王、汉族大地主与蜀中大地主的合流，构成大成政权的统治核心，这就是大成政权的阶级实质。范长生在大成政权内所享有的经济特权与西晋的贵族王公并无两样，也就是大地主特权在大成政权中的合法化。

## 二　全盘汉化的封建政权机构

流民政权初建至李雄称帝，已有三年历史，官僚机构虽然已经建立，但不完善，还有“诸将恃恩，各争班位”的事发生，尚书令阎式建议改革官制，他上疏说：“夫为国制法，熏尚仍旧。汉晋故事：惟太尉、大司马执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论道之职，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总领万机。汉武之末，越以大将军统政。今国业初建，凡百未备，诸公大将班位有差降，而竞请施置，不与典故相应，宜立制度以为楷式。”(《晋书·李雄载记》)

李雄采纳了阎式的建议。此后，大成的政权机构，官僚制度就是按照汉、晋旧制在原来的基础上完备起来的。其主要职官如下：

丞相（范长生、范贲、杨褒）、相国（李越、董皎），秦官，汉魏因之。(《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它的职务：“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晋初不设，惠帝以后，省置不定。

太师（范长生、龚壮、董皎）、太傅（李骧）、太保（李始），周的三公。晋改太师为太宰（避司马师讳）。在晋为上公。(《晋书·职官志》）说：上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

太尉（李离、李宝）、司徒（王达、何点、王环）、司空（上官惇），都是周秦古官。从汉到魏，为三公。晋因之。太尉掌军事，司徒掌民事，司空掌水土。

大将军（李寿、李势、李广），汉官。司马懿、司马师曾居此职。位在三公上。有时在三公下。

骠骑将军（尹奉），汉官。位次丞相。

车骑将军（李越、王韬），汉官

卫将军（尹奉），汉官。《续汉书》刘昭补注说：将军“掌征发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次卫将军。”

中领军（李琀、李都、李霸），魏官，源于汉代的北军中候，领北军，保卫京师。魏文帝曹丕即王位，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晋）武帝初省，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后左右骁骑七军营兵，即领之任也。”（《晋书·职官志》）

中护军（李寿），本秦护军都尉，汉有护军中尉、护军都尉。建安中，改护军为中护军。魏初为护军将军。“主武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逮也。”（同上）

四征：征东（任颀、李寿、李始）、征南（费黑）、征西（李遐）、征北（李凤、李寿、李玝）。

四镇：镇东（李闳、李奕、李位都）、镇南（任回、李权）、镇西（李保）、镇北（任调）。

四安：安东（李期）、安西（徐舆）、安北（李稚、李攸）。[44]

四征、四镇、四安，都是汉魏以来的旧官，品秩第三。

尚书令（阎式、王环、景骞、马当、罗恒）、尚书仆射（李载）、仆射（罗演、任颜）、左仆射（蔡兴）、尚书（李摅、姚华、田褒），秦开始有尚书四人，“殿中主发书。”汉代以后，尚书分曹掌事。应劭《汉官》说：“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禀（廪）假钱谷。三公尚书二人，掌天下

岁尽集课；吏曹掌选举、斋祠；二千石曹掌水、火、盗贼、词讼、罪法；客曹掌羌、胡朝会，法驾出，护驾；民曹掌缮治、功作、盐池、苑囿”(《宋书 · 百官志》上引)。魏有五曹尚书，晋有六曹尚书。

录尚书事（李寿、李越）《晋书 · 职官志》说：“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

司隶（费黑)。《晋书 · 职官志》说：“司隶校尉，案汉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隶校尉，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历汉、东京及魏、晋不替。”

侍中（李艳、张烈），秦置，汉因之。魏、晋以来置四人，加官不在此数。“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晋书 · 职官志》)

中常侍（许涪、王广)、散骑常侍（常璩)，秦官，“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魏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瑺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同上）

廷尉[45]，秦官，汉、魏、晋因之，汉属九卿，晋在列卿，“主刑法狱讼。”（同上）

太史令（韩约、韩皓)，古官，两汉属太常，晋同。“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续汉志 · 补注》)

刺史（益州：严柽，梁州：李骧、李玝，李寿，宁州：李寿、霍彪，交州：爨深，荆州：李恭），汉官，魏，晋因之。

太守（蜀郡太守严柽、广汉太守李超、德阳太守蹇硕、犍为太守李溥……），掌治郡，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王、公、侯（李寿封建宁王、汉王，李广封汉王，李越封建宁王；李载封武陵公，景蹇封河南公；范长生封西山侯），成·汉封王、公、侯，也是汉武帝以的食封相同，受封的人“食租税，”在封地内并无领土治民的权利。

校尉（东羌：李寿、李奕、任调；西夷：李寿、李保），《晋书·职官志》：“护羌、夷、蛮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蛮校尉于襄阳，西戎校尉于长安，南夷校尉于宁州。……”《华阳国志·大同志》：“太康三年……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吴军司张牧为校尉，持节统兵，州别立治。西夷治蜀。……五年，罢宁州，诸郡还益州，置南夷校尉，持节如西夷……。”

以上是一份不完整的成·汉职官表（参见万斯同《伪成将相大臣年表》）。我们可以从此看出成·汉的职官制度完全按汉、魏、晋的模式建立和完善起来。也就是说，以賨人李氏为核心的政权机构全盘汉化，从组织形式看，毫无民族特色，这与賨人汉化程度深及其与州郡大姓（即汉族地主）的合作分不开。国家机构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总是一部阶级统治的机器。同时它是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的反映，所以一定的阶级结构和一定的政治结构，必须适合一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态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换作用的产物。……有一定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阶

段，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是有一定的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公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公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政治制度”（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马恩选集》两卷集，Ⅱ，第四四二页）。大成的统治者只有采用现存的封建政治制度才能适应梁、益二州已经发展了的封建经济。

大成政权的政治措施，文献上反映很少。大约在李雄称帝后不久，曾经“除晋法，约法七章”（《晋书·李雄载记》）。晋朝法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晋书·刑法志》）。李雄的“约法七章”，当然比晋法简易，比李特的“约法三章”又有增益。可惜没有留传下来，无从探索“七章”的具体内容。

## 三　奠定疆域

大成政权建立，都城定在成都。大成初建时，只能控制三蜀、梓潼、巴西数郡，西晋的军队包围着它。李雄想要维持他的统治，就必须打破这个包围圈，扩充地盘，发展生产，增强实力，否则，便不能生存下去。李雄即位时，中国境内有三个政权并存，即賨人建立的大成，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还有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西晋。李雄在这样的形势下，积极对周围用兵，排除了晋朝的势力，奠定了大成的疆域。

罗尚逃出成都，永兴元年（公元三〇四年）春天，到了江阳（治今泸州市）。西晋朝廷叫他“权统巴东（郡治鱼复，今奉节白帝城），巴郡（治江州，今重庆市）、涪陵（治汉复、今彭水

境），以供军赋”（《华阳国志·大同志》）。同时，罗尚又派人到荆州刺史刘弘那里告急请粮。刘弘为了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慷慨予以支援，拨给三万斛米，又遣荆州治中何松领兵屯巴东为罗尚后盾。这年冬天，罗尚从江阳迁屯巴郡，派兵扰蜀中，杀了大成的李冉，俘虏李骧的妻子昝氏、儿子李寿。“永嘉元年（公元三〇七年）春，尚施置关成至汉安（属成的江阳郡，治今内江市西）、僰道（属成的犍为郡，治今宜宾市西南），……又施置诸村参军”（同上）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罗尚的政治控制与军事系统，他的地位又稳定下来，想从东南两方面对李雄施加压力。此外，梁州方面也可以派出军队向大成进攻。李雄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他不与罗尚正面作战。宁州方面，由于少数民族的反抗，李毅之死，还没有力量进攻大成，李雄在这时也没有力量管它。首先，向汉中用兵。

汉中“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西，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贡赋所出，略侔三蜀。六国时，楚强盛，侵有其地，后为秦，恒成争地”（《华阳国志·汉中志》）。汉中的战略地位，对益州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杨洪与诸葛亮论它的重要性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三国志·蜀志·杨洪传》）。所以，李雄夺取汉中，起码可以巩固西北，东向与罗尚斗争，免除后顾之虞。

衙博在梓潼阳沔战役失败，西晋朝廷委任许雄为梁州刺史。汉中是梁州刺史治所所在。梁州是益州的邻州，那时，它有责任支持益州。当李雄粉碎罗尚发动的三路进攻，进一步夺取成都的时候，许雄‘以讨贼不进，槛车徵诣诏狱”（《华阳国志·大同志》）。梁州刺史暂缺，只有汉中太守杜孟治、都

战帅赵汶等人率兵守汉中。李雄建兴元年（公元三〇四年）十二月，大成李离攻汉中，杀都战帅赵汶。西晋朝廷任张殷为梁州刺史。晏平二年（公元三〇七年）三月，关中流民邓定、訇氐据成固（今映西成固东），寇掠汉中。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领兵把他围了，邓定饥窘，诈降，又送货赂，张燕缓兵不攻。邓定又密遣訇氏向李雄求援。五月，李雄遣李离、李云、李璜、李凤将兵二万往汉中救援邓定。李离攻下张燕属部，张燕就惧战逃走，李离等大败梁州兵。汉中方面看到大成军队来势甚猛，先声夺人，杜孟治被吓破了胆，他说：“州军已破，贼众不可待也。”“（李）雄冒称帝王，纵横天下，以遣重众，必取汉中，虽有牢城，士民破胆，不可与待寇也”（《华阳国志·大同志》）。汉中守将开门退走。“护军北还。孟治入大桑谷，民数千家，车数千两，一夜行才数十里。而梓潼荆子以父与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于谷口；孟治弃子走，荆子获之，及吏民千余家。惟汉国[46]功曹毋建荷檐杖，曰：吾虽不肖，一国大夫，国亡不能存，终不属贼也，饿死谷中”（同上）。刺史张殷也弃城逃跑。可是李离没有驻汉中，十多天后，大成军队也撤退了。由于罗尚不断从东南方面施加压力，李雄不敢全力争夺汉中，遣平寇将军李凤屯驻晋寿（今广元县昭化），不断向汉中进攻，汉中百姓又往荆州迁移。

在李雄争夺汉中过程中，晏平四、五年间，大成军队中相继发生了倒戈事件。出现一度不利于李雄的形势。

晏平四年（公元三〇九年）冬，天水訇琦等杀太尉李离、尚书令阎式，以梓潼降罗尚。寻机报仇的谯登杀了大成的巴西

太守马脱，趁訇琦投降之机，进据涪城[47]。李雄亲自率军出击，为谯登打败。晏平五年（公元三一〇年），成太尉李国镇守巴西（郡治阆中），被帐下文石（或作文硕）所杀，以巴西降罗尚。与之同时，西晋的折冲将军张罗进据犍为的合水（今彭山县）向奋屯安汉（治今南充市北）的宜福。那时，蜀中唱出一首歌谣，说："谯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张罗守合水，巴氐那得前！"(《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雄为了改变这种困难局面，选定梓潼为突破点。那时，大成将张宝的弟弟张全在訇琦军中，李雄使张宝为间谍，许以事成之后，代李离为太尉。张宝奔梓潼，密结心腹，等待时机。一天，罗尚派人慰劳訇琦，訇琦等人送使者出城，张宝把城门关闭，訇琦等欲归不得，只好逃奔巴西。李雄收复梓潼，拜张宝为太尉。接着，李雄亲自击向奋，奋败走。

晏平五年（公元三一〇年）七月，流民军的死对头罗尚死了，西晋朝又派皮素为益州刺史。十二月，皮素为部下所杀，巴郡呈现一片混乱，在涪城内的谯登食尽援绝，李骧加紧进攻，城中士民捉老鼠吃，饿死了不少。玉衡元年（公元三一一年）正月，攻下涪城，俘虏谯登。梓潼、巴西复归于大成。

巴郡虽然在罗尚死后出现混乱，但还有一股西晋的顽固势力在巴郡、涪陵一带活动。公元三一一年，荆湘地区爆发了流民起义，影响了从大成叛降罗尚的苻成、隗文。他们从宜都（晋宜都郡治夷陵县，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西上巴东，起兵反抗，在当时的益州政府心脏进行一场剧烈的战争，败杀了代行三府[48]的事的张罗，弄得"巴中无复遗种"，隗文"驱略吏民西降于雄"（同上）。这是对西晋在巴属的残余势力一个很

大的打击。玉衡二年，西晋在川东的残余力量想继续维持下去相当困难了。因为当时“中原丧乱，江东有事，救援无所愿望”(同上)，残兵败将们想从涪陵郡枳县（今涪陵县西）下巴东向荆州溃退。当其正在移动，被大成的李恭、费黑破获，把他们一网打尽，扫除了川东之害。玉衡四年（公元三一四年），李雄任命李恭为荆州刺史。

长期没能解决的汉中，这年，杨虎归成，汉中也归入大成版图。

平定宁州。晏平元年（公元三〇六年）二月，宁州刺史李毅卒，西晋朝廷调王逊为宁州刺史，晏平五年（公元三一〇年）到达任所。他到任后，“专杖威刑，鞭挞殊俗”、“多所诛锄”、“威行宁土”，引起宁州人的强烈不满。于玉衡六年（公元三一六年），“犍为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阴贡、平乐太守董霸破牂柯平夷（今贵州毕节）、南广（今云南盐津），北降李雄。建宁(郡治味县，今云南曲靖）爨量与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东）太守董慬保兴古(郡治律高，今云南弥勒南)、盘南（盘江以南）以叛”(《华阳国志·南中志》)。

王逊统治宁州几年，弄得官府与少数民族头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他统治下的太守也反对他。在宁州主客矛盾尖锐的时刻，李雄派军进攻宁州。

玉衡九年（东晋元帝大兴二年，公元三一九年），大成太傅李骧攻越巂（郡治邛都，今西昌），又分兵攻朱提。次年，俘虏西晋的越巂太守李钊。

玉衡十三年（公元三二三年）正月，李雄、李骧、任回攻台登（属越巂郡，治今冕宁南的泸沽），杀晋将司马玖。李骧

继续前进，遭到越嶲太守李钊[49]和前汉嘉（郡治汉嘉，今芦山县境）太守王载的联合抵抗，两军战于温水[50]，晋军失败，李钊、王载[51]投降。

这时，东晋发生了王敦之乱，元帝气愤而死。明帝新立，还在忙于办丧事，那里有精力照顾宁州方面的军事。

同年五月，李骧沿孙水（今安宁河）而下，渡泸水（今金沙江），入小会，向宁州进发。王逊遣将军姚崇（或作姚岳）、爨琛拒之，战于堂螂[52]，大破李骧军。李骧退军，渡泸水，士兵落水死者千余人。姚崇追到泸水，不改渡泸水而退。这一战，以李骧失败退军而告终，宁州的大部分土地仍为东晋所占有。

玉衡二十二年（公元三三二年），李寿南征宁州，以征东将军费黑为前锋，由南广（属朱提郡，治今云南盐津）进军，直攻宁州；又别遣任回击越嶲：两路进攻，对宁州形成钳形攻势。十月，李寿、费黑率领的部队到达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守。大成军队把朱提团团围困。宁州刺史尹奉派建宁太守霍彪、大姓爨琛等援助董炳。援军将到，李寿想把援军堵截在城外，以为城中守兵少，容易攻下。费黑说：不然，估计城中粮食不多，霍彪带来的粮食也不会多，应该让他们进城，一起吃那点粮食，还嫌城中人太少哩。这样，不用多久，城中就会无粮。为什么不准他们入城呢？果然不出费黑所料，围困百日，到次年正月，董炳、霍彪出城投降。宁州刺史尹奉以全州的名义投降。迁尹奉于成都。宁州所统十四郡，除牂柯一郡外，其余十三郡归入大成版图。封李寿为建宁王，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

东晋在陇西抗击前赵刘曜的陈安，于玉衡九年降于成。仇池（氐人建国。在今甘肃成县、文县一带）杨难敌兄弟也在玉衡十一年奔葭萌降于成。

李雄统治时期，大成的版图，东到巴东，北到汉中、仇池，西至汉嘉、沈黎（今雅安专区），南到宁州，奠定了大成版图的格局。

## 四　经济成就

常璩说：“（李）雄虚己受人，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谷丰登……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又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帛数两；事少役稀，民多富实……”（《华阳国志·李雄志》）。这是常璩亲眼看到的。李雄统治时期，大成的农业经济（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确实有了恢复发展。

益州人民在赵廞、罗尚的统治下，遭受深重的灾难，怨声载道。李雄“宽和政役”、“事少役稀”，让人民能喘得过气来，有时间、有精力从事生产，赢得农业丰收，生活富裕起来。难能可贵的是，在大成政权下，不断向周围用兵，需要大量军费，还能减轻农民的赋调。大成的赋调制度完全因袭西晋的户调式与占田课田制。“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男人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晋书·食货志》）“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初学记》宝器部引《晋

故事》)。两相比较，大成的每一丁男田赋比西晋每一丁男田赋少一斛。户调更是大幅度下降。布帛四丈为一匹。大成人民输绢、绵不及西晋的三分之一。可算是轻徭薄赋了。

但是，在大成统治范围仍然存在土地占有悬殊的状况。

> 《晋书·李班载记》说:“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

李班的大均思想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但是很可贵。他看到现实中存在耕种土地的农民“种植无所”，不耕种土地的‘贵者”却“广占荒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的现象。这太不合于古义，他表示不满。

大土地占有制，在封建社会中，并不是稀罕的事，而是大量的，必不可免的。恩格斯说:“从那瞬起，当自由地一旦变为可以自由出让的土地财产，变成商品的土地财产，从那一瞬起，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11 月,单行本,第 72 页)。中国自春秋末年开始土地自由买卖到了西汉初年，土地兼并的结果，大土地所有制出现了。全国如此，四川地区也不例外。

四川的大土地所有者，在魏晋时期称为大姓。这种大姓在经济上很富有，并且还拥有私人武装——部曲。其力量之大，有时可以与朝廷对抗。

> “延熙十三年（公元二五〇年),（涪陵）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乃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

世掌部曲，为大姓。”（《华阳国志·蜀志》）

“郪县有山原田，富国盐井，濮出好枣，宜君山出麖（顾校：当作麈）尾，特好，入贡。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马家，世掌部曲。蜀时高胜，马秦皆叛，伏诛”（同上）

随涪陵豪族地主而迁徙的五千家，除少数徐、蔺、谢、范豪门外，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豪门的依附农民。象这样的大姓，在西晋时期的梁、益二州较为普遍的存在于各郡县。兹据《华阳国志》列表如下：

| 州　名 | 郡　名 | 县　名 | 大　　姓 |
|---|---|---|---|
| 梁 | 梓潼 | 梓潼 | 文、景、雍、邓 |
| | | 涪 | 杨、杜、李 |
| | | 晋寿 | |
| | | 白水 | |
| | | 汉德 | |
| | 广汉 | 雒 | 谭、李、郭、翟 |
| | | 绵竹 | 秦、杜 |
| | | 什邡 | 杨 |
| | | 五城 | |
| | | 郪 | 王、李、高、马 |
| | | 广汉 | ×，×二姓为甲族 |

| | | | |
|---|---|---|---|
| | | 德阳 | 康、古、袁、×四姓 |
| | 涪陵 | | 徐、蔺、谢、范 |
| | | 涪陵 | |
| | | 丹兴 | |
| | | 汉平 | |
| | | 万宁 | |
| | | 汉发 | |
| | 巴 | 江洲 | 波、鈆、毋、谢、然㦃、杨、白、上官、程、常 |
| | | 枳 | 章、常、连、黎、牟、阳 |
| | | 临江 | 严、甘、文、杨、杜 |
| | | 平都 | 殷、吕、蔡 |
| | | 垫江 | 黎、夏、杜 |
| | | 乐城 | |
| | | 常安 | |
| | 巴西 | 阆中 | 三狐、五马、蒲、赵、任、黄、严 |
| | | 南充国 | 侯、谯 |
| | | 安汉 | 陈、范、阎、赵 |
| | | 平州 | |
| | 巴东 | 鱼复 | |
| | | 朐忍 | 扶、先、徐 |
| | | 汉丰 | |

| | | | |
|---|---|---|---|
| | | 南浦 | |
| | 宕渠 | 宕渠 | |
| | | 汉昌 | 勾 |
| | | 宣汉 | |
| 益 | 蜀 | 成都 | 柳、杜、张、赵、郭、杨 |
| | | 郫 | 何、罗、郭 |
| | | 繁 | 三张 |
| | | 江原 | 东方、常 |
| | | 临邛 | 陈、刘 |
| | | 广都 | 朱 |
| | 犍为 | 武阳 | 七杨、五李 |
| | | 南安 | 四姓、五大族 |
| | | 僰道 | 吴、魏 |
| | | 牛鞞 | 程、韩 |
| | | 资中 | 王、董、张、赵 |
| | 汶山 | | 缺 |
| | 汉嘉 | | 缺 |
| | 江阳 | 江阳 | 四姓、八族 |
| | | 汉安 | 四姓、八族 |
| | | 符 | |
| | | 新乐 | 魏吕 |

| | | | |
|---|---|---|---|
| | 越嶲 | | 各县无 |

附注：梁州、益州各郡按《晋书·地理志》所列次序排列，郡下各县依《华阳国志》，其省并均置而不论，目的只在于说明大姓分布情况。上表所列梁、益二州的大姓，常璩没有区分时代，按文理，它包括了蜀汉、晋和成·汉。常璩对大姓的活动，也作了一些描述，如：蜀郡成都县的大姓“恣纵”、“多犯法”，郫县大姓“阳伯侯奢侈，大起冢营（茔）”；广都“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华阳国志·蜀志》）。从上述情况，不能看清大姓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之中，而范长生一家则可算典型。他领有千余家住在青城山下，这千余人家是他的依附者。范参加大成政权后，大成皇帝免除了全部依附者的徭役。他在青城山下占有大量土地（可供千余家耕种），大成皇帝免除了全部租赋。范长生这家可算是梁益地区大土地占有形式的标本。这种占有形式的组织，当时称作“村保”。

关于村保的材料，实在太少，往往不被重视；但是，值得注意。

当赵廞与耿滕相争于成都城内时，蜀郡功曹对耿滕说：

“……不如安住少城，檄诸县，合村保以备秦氏……”（《华阳国志·大同志》）。

“永兴元年……冬，（罗）尚移屯巴郡……永嘉元年春，尚施关置戍，至汉安、僰道。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嶲、牂柯，尚书(旧校：当作施。)置郡县，就民所在，又施置（置字据旧校补）诸村参军”（同上）。

如上所引材料，反映了如下事实：1. 六郡流民入蜀以前就有村保；2. 蜀郡各县都有村保；3. 罗尚在诸村设参军也是以村保为单位，其范围在蜀郡以外。

村保，《华阳国志》作村保，《晋书》作邨堡。邨同村，保通堡。《礼记·檀弓》：“公叔禺人遇负杖入保者息。”郑康成注：“保，县、邑小城”。《庄子·盗跖篇》：“小国入保”。成玄英疏：“保，小城也。”村保，或者也有保，作为它的中心。西晋时村保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我们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它的外貌。

> 《晋书·李流载记》说：“（李）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督领邨堡。流言于特曰：殿下神武，已克小城，然山薮未集，粮仗不多，宜录州郡大姓子弟以为质任，送付广汉，絷之二营。收集猛锐，严为防卫。又书与特司马上官惇，深陈纳降若待敌之义。特不纳。”

> 《晋书·李特载记》说：“是时，（李特入少城时——引者）蜀人危惧，并结邨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尚曰：特既凶残，侵暴百姓，又分人散众，在诸邨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时也。可告诸邨，密克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从之。……明潜说诸邨，诸邨悉听命。还报尚，尚许如期出军，诸邨亦许一时赴会。”

从上两条材料可以看出：1. 李特进入少城，村保“请命于特”，说明村保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不是单家独户的村舍小农。2. 罗尚利用村保反李特，说明村保拥有武装，二月

十日诸村保配合官兵打败了李特，证明村保确有武装。3. 诸材保向流民军投降，李特即派壮勇去各村保“督领，”是李特也注意到村保的重要性。李流、李雄都反对李特对村保的办法。李济认为，村保的投降是靠不住的，应当录取大姓子弟作为人质，才能控制村保，足见大姓是村保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范长生在青城山下所率领的千余家依附者，就属于这类村保，与中原地区的庄园相同[53]，是梁、益地区大土地占有形式的具体表现。李班看到这样的村保，就感到惊讶，说它不合符“王者大均之义!”大成政权就是一大群贫苦的六郡各族人民在李特等流民上层人士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他们深感流民失掉了基本劳动手段——土地的严重性，对农民要求土地的思想也很理解。李班是个饱读儒书的人，从中看到长期以来土地兼并，是一尖锐的社会问题，历代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原则、方案，自孔、孟而后，董仲舒至荀悦，颇不乏人。他们往往主张实行井田制，使劳动农民得到一定土地，既可交纳赋税，也可以维持一家人最起码的生活，从而保持社会稳定，这就是李斑追求的理想社会。他把书本知识同现实的土地问题联系起来研究，便具有现实意义，从而也反映了大成政权下土地问题的严重。

## 五　文化建设

李雄曾“兴学校，置史官，”对于文化建设作了一些工作。兴学校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培养了多少人材，不见记载，成·汉的学者、文士，史学所可称述的，只有常璩和他的《华

阳国志》。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县（治今崇庆县境）人。常氏在江原为大姓，常璩、常勗、常骞、常宽等，他们本人或他们的父祖都先后在蜀汉和晋朝做官。常氏又以儒学传家，常勗、常骞、常宽对儒家经典，如:《毛诗》、《尚书》、《春秋》、《三礼》、《易》等经书颇有研究。常璩也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在大成做官，官至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亲近皇帝，必须由皇帝亲幸或者人材、门第高尚的人才能充当[54]。

常璩的行事，我们知道的很少，很可能，他的主要职务是史官，孙盛称为“蜀史常璩”(《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附董厥传》注引孙盛《异同记》)。在汉国存在的时候，他就撰成了《汉之书》十卷，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史通·古今正史篇》)[55]。《蜀李书》流传不广，至少在北方很难看到。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各国史都写成了，只有关于賨人李氏政权的《蜀李书》，“搜求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到魏正光三年（公元五二二年)，“访购始得”，于是崔鸿根据常璩的《蜀李书》补写了《蜀录》，才完成全书，定名《十六国春秋》，合计一百二卷，称为“近代之事最为备悉”的史书（《魏书·崔光传附崔鸿传》)。

汉国灭亡，常璩随李势到建康后，他对乡土史研究的兴趣颇为浓厚，立志著一部包括梁、益、宁三州历史、地理的专著，这就是流传到现在的《华阳国志》[56]。此书包括“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的史事。其中蜀汉、晋代、成·汉的史事，或得自故老传闻，或为亲身经历，准确性大，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著作。

常璩撰著《华阳国志》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他在《序志》篇中说："博考行故，总厥旧闻。班序州部，区别山川。宪章成败，旌昭仁贤。抑绌虚妄，纠正缪言。显善惩恶，以杜未然。"这四十个字概括了常璩著述《华阳国志》的功力，也表明的他著述的目的。功力是深的。虽出于自叙，也当之无愧。目的则必然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自然也就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

这部书是在入东晋之后写的，所以，他也说了些失实的话。如："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嗟呼！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城旷为长野。""薨：特、流，肆其豺狼，荡、雄纂承，歼我益、梁。"但是，瑕不掩玉，优点是主要的。

# 第六章　汉国的衰落

## 一　李氏皇族的内讧

封建帝王总想万世一家。为此，他们都及早选立太子作为法定继承人。选择太子的原则还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时期就定下了，主要是嫡长继承，辅以兄终弟及和立贤。李雄立李班为太子是属于立贤一类。本来李雄打算立李奕（李班的大一哥）为太子，后来在与仇池杨难敌的战斗中阵亡，为此李雄好几天吃不下饭，一提起就流涕，很为痛惜，责咎自己。李雄没有嫡子，有庶子十五人。群臣上书请立太子，意思是要立李雄亲生儿子，而李雄在立太子这个问题又有固定的指导思想，他对上书请立太子的群臣说："孙仲谋割江东，伯符兆基，子止侯爵，《国志》耻之[57]：宣公舍子昱弟，君子以为知人[58]；吾将弥缝《国志》之耻，以继宣公之美"（《华阳国志·李雄志》）。

李雄意在立贤，也有点沽名钓誉。为什么要立李班，李雄也不是没有理由，他说："起兵之初，举手扞头，本不希帝王之业也。值天下丧乱，晋氏播荡，群情举义，志济涂炭，而

诸君遂见推逼，处王公之上。本之基业，功由先帝。吾兄适统，丕祚所归，恢懿明睿，殆天所命，大事垂克，薨于戎战。班姿质仁孝，好学夙成，必为名器”(《晋书·李雄载记》)。所谓先帝就是李特，吾兄就是李荡。李荡为李特的嫡长子，在追击罗尚退军中牺牲。至于李班，也有优点，仁爱、好学，将来“必为名器”，所以李雄要立李班为太子，李雄坚持立李班，当时就遭宗室重臣太傅、大将军李骧、司徒王达的反对。李雄仍然不改原意。李骧下来说，乱子就要从这个问题上发生。大成统治者内部厮杀，真的是由于立李班为太子而埋下的祸根所引起，它成了李氏宗室内讧的导火线，也是大成政权从盛到衰的转折点。

玉衡二十四年（公元三三四年）六月，李雄病死，太子李班即位。李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为性汎爱，动修轨度。”(《晋书·李班载记》）李班是一个浸透儒家仁孝、汎爱思想的慊慊君子，而李雄的第四子李期，“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轻财好施，虚心招纳。初为建威将军，雄令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众，多者不至数百，而期独致千余人。其所表荐，雄多纳之，故长史列署多出其门”(《晋书·李期载记》)，官安东将军。期兄越，官车骑将军，镇江阳。李骧之所以耽忧，正是看着李期、李越弟兄，在李雄死后，他们不会安分守己。李班嗣位，李越马上表露出来，“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同上)。李越从江阳奔丧至成都，同李期密谋取代。李班弟李玝劝班命令李越回江阳，把李期外调为梁州刺史，镇葭萌。李班因李雄还没有安葬，不忍心遣调他们，“推诚居厚，心无纤芥”(同上)。十月的一个夜晚，李越乘李班夜哭，杀班于李

雄的灵柩旁边，又杀班兄都和儿子颙等。李期即帝位，次年（公元三三五年）正月，改元玉恒。

李期即位，就进行人事大更动：改封李寿为汉王，拜梁州刺史、东羌校尉、中护军、录尚书事；封兄越为建宁王，拜相国、大将军、录尚书事；以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骠骑将军；尚书令王瓌为司徒，景骞为尚书令。

李玝，李班之弟，在李班刚嗣位时，曾经劝李班赶李期兄弟出成都；李玝官征北将军、梁州刺史，镇涪，手握重兵；自然是李期的反对力量，李期更不能容忍他存在，使李寿带兵讨伐。李寿“告以去就利害，假道”（《华阳国志·李寿志》），放他顺流东下投降东晋。

玉恒二年（公元三三六年）五月，仆射罗演（李班之舅）与汉王相上官澹策划袭杀李期，立李班儿子李幽，由子消息泄露，罗演、上官澹等皆被杀。

李期把这一切做完之后，踌躇满志，忘乎所以，“轻诸旧臣。外则信任尚书令景蓦、尚书姚华、田褒。……内则信宦竖许涪等。国之刑政，不复关之卿相，庆赏威刑，皆决数人而已，于是纲维紊矣”（《晋书·李期载记》）。尚书仆射李陵公李载“多才艺”，被诬为谋反，下狱，死于狱中。李期的兄弟李霸、李保无病暴死，人们都说是李期鸩杀的。“期多所诛夷，籍没妇女，资财以充后庭，内外凶凶，道路以目，谏者获罪，人怀苟免”（同上）。

李寿也是李期、李越所不能容忍的人。他是李特之弟李骧的儿子。累立战功，封建宁王，在大成朝廷中有很高的威望。“寿威名远振，深为李越、景骞所惮”（《晋书·李寿载记》）。

李寿在李越看来，犹如眼中钉，势在必拔。当李期杀李班自立之初，李特的儿子李始有心依靠李寿讨李期，李寿不敢发难，李始反而教唆李期袭取李寿。由于那时李玝还掌握重兵镇守在涪，李期想借李寿的威望与力量消灭李玝。李寿并没有把李玝消灭，而把他放走了。李寿放出李玝之后，李期以李寿镇涪，实是对李寿的疏远。李寿与李期之间的矛盾明显地存在着。李寿也很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常为自身的安全发愁。他死死握住兵权，不愿离开镇所一步。“每应期朝觐，常自陈边疆寇警，不可旷镇，故得不朝”（《晋书·李寿载记》）。但是，李期兄弟十多人，拥有强兵，对李寿是极大的威胁。李寿恐怕自己难于保全，便礼聘巴西龚壮求自安的良策。龚壮说：“立事何如舍小从大，以危易安……”（《华阳国志·李寿志》），意思是李寿要改善处境，必须舍臣位之小，从帝位之大，才能变危险为安全。李寿接受了龚壮的意见，并把它付诸行动，同他的亲信罗恒、解思明密谋进据成都的方略。

李寿密谋策划，季期也有所风闻，几次派中常侍至涪窥觑动静，又把李寿的养弟安北将军李攸鸩杀。李寿预感事态严重，必须先发制人，乃假造妹夫任调来信说：李期、李越要废黜李寿。群下信以为真。舆论工作作好了，追随李寿的人更趋向李寿。时机成熟了，李寿宣誓文武，许诺进入成都，城中资财任意掠取。李寿“帅步骑万余人自涪袭成都”（《通鉴·晋纪》）。出发前李寿上了一封清君侧表文，说：“景骞、田褒乱政，兴晋之甲，以清君侧之恶”（《晋书·李期载记》）。李奕为先锋，倍道兼程。李期没有预料到李寿会拥

兵前来，城外也没有设防。兵临城下，翊军校尉、李寿的世子李势，大开城门，李寿直入城内，把军队屯驻在宫廷外面。李期完全丧失了控驭能力。李寿提出一份罪犯名单，其中有：相国、建宁王李越，尚书令、河南公景骞，尚书田褒、姚华、中常侍许涪，征西将军李遐及将军李西等。指控他们的罪名是："怀奸乱政，谋倾社稷，大逆不道，"其罪恶之大，合应"夷灭"（同上)。这些条件，李期全部答应了。大军入城，虏掠奸淫，多所残害，闹腾几天才安定下来。废李期为邛都县公。这年四月，李寿即帝位，改国号曰汉，改年号为汉兴。

李寿即位后，改立宗庙，更旧庙为大成庙。新任董皎为相国，罗恒为尚书令，解思明为广汉太守，任调为镇北将军、梁州刺史，李奕为西夷校尉，从子李权为宁州刺史。公卿州郡的长官全用李寿的僚佐代换，"于是成都诸李子弟无复秉兵马形势者，雄时旧臣及六郡人皆斥废也"(《华阳国志·李寿志》)。又诛杀李始及兄弟十余人。

这样一来，大失人心，引起两方面人士的反对。一方面，李氏宗室的反抗。七月，李奕从兄弟李乾与大臣合谋废寿。李寿使儿子李广与大臣盟于前殿，"要（音 yāo，结的意思）为兄弟"。徙李乾为汉嘉太守，以李闳为荆州刺史，镇巴郡。这是李寿对旧臣的妥协，不仅对李闳加官，委以方面重任，而且"寿许以自牛鞞以东土断与闳"(同上)。由于执政者的反对，才没有割封土地。九月，汉仆射任颜又反。任颜是李雄任后之弟，他想同诸甥废寿，于是李寿尽诛李雄诸子，以绝人望。另一方面，龚壮等人反对李寿称帝而不向东晋称藩。这个问题在汉朝廷之内有过议论。这是一股小风，吹绉了汉国一池

春水。提出汉国向东晋称藩的是龚壮。龚壮，巴西人，与成·汉政权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他的父亲、叔父在李特时为流民军所杀，积年不除丧，随时寻找机会报仇。李期在位，李寿与李期有矛盾，李寿感到处境危险，几次聘请龚壮，向他请教改变处境的办法。龚壮出了个主意："并有西土，称藩于晋"(《晋书·隐逸·龚壮传》)。当时，罗恒、解思明也持这种主张。在废李期之前，李寿"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众，举国称藩"(《华阳国志·李寿志》)，信誓旦旦，满口答应。李寿进入成都后，罗恒、解思明、李奕、王利等劝李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向晋称藩。任调、蔡兴、李艳等劝李寿称帝。李寿接受了后者的意见，称汉皇帝。这年闰八月，"天连阴雨，禾稼损伤，百姓饥疫，"龚壮趁此机会上封事，说什么"或在天以监示天下"，"玄宫之谶难知，而盟誓顾违，一旦疆场有急，内外骚动，不可不深思长久之策，永为子孙之计也。愚谓宜遵前盟誓，结援吴会，以亲天子，彼必崇重，封国历世，虽降阶一等，永为灵德……"（同上)。次年，罗恒、解思明因李寿病"复议奉晋计"，李演（晋宁州刺史李毅的从孙)"自越嶲上书劝寿归正返本，释帝称王，寿怒杀之"（同上)。

## 二　暴　　政

李寿兴晋阳之甲，夺得帝位，统治集团内部还是不平静。反对者大有人在。但是，李寿夺位后的两三年内能够"承雄宽俭……因循雄政"(《晋书·李寿载记》)，还能稳住局面，没有

出现大乱子。自从汉兴三年（东晋成帝咸康六年，公元三四〇年），李闳、王嘏出使后赵归汉以后，李寿羡慕石虎，效法他滥用刑罚，务于奢侈；汉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逐渐尖锐化了。《晋书·李寿载记》说：“李闳、王嘏从邺还，盛称（石）季龙威强，宫观美丽，邺中殷实。寿又闻季龙虐用刑法；王逊以杀罚御下，并能控制邦域。寿心欣慕，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兴上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又广太学，起讌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这里所列举的各事，大都服务于李寿一小撮皇室、官僚的享乐，而且集中在三年内兴办，当然老百姓受不了，以致“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由于李寿的胡作非为，左仆射蔡兴切谏，李寿给扣上“诽谤”的罪名，把蔡兴杀了。右仆射李嶷多次直言，李寿很不高兴，逮捕入狱，死于狱中。

李势继立，关于李广求立为太弟[59]问题，又发兵讨李广，把主张同意李广要求的重臣马当、解思明杀了，还诛了三族。汉嘉宁元年（公元三四六年），太保李奕从晋寿举兵反，蜀人参加的有几万，可见李势之不得人心了。

李势是一个极端无能与荒唐的皇帝。李寿交下的汉国，已经是矛盾重重，“思乱者十室而九”，李势不但不能有所作为，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促使问题更加严重。《李势载记》说：“势既骄吝，而性爱财色，常杀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国事。夷僚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加之荒俭，性多忌害，诛残大臣，刑狱滥加，人怀危惧。斥外父祖巨佐，亲任左右

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内，少见公卿。”

旧问题，新问题，僚人反抗，自然灾害，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等等，一切集中在李势身上，弄得汉国国力微弱，正是东晋灭汉的大好时机。

## 三　桓温灭汉

当李氏的汉国一天一天地烂下去的时候，偏安江左的东晋在几经内乱之后暂时安定下来。东晋的一些当政者总是把中原的胡和蜀中的汉列为两大敌人，时时想把它们灭掉。庾亮执政，于李寿汉兴二年（公元三三九年）发动北伐，先遣偏师伐蜀，俘虏了汉国的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60]。当时，主要目标是后赵，伐蜀不过张大声势而已。庾亮北伐失败，伐蜀的计划自然也弃置不问。庾亮死后，他的弟弟庾翼执政，志大意广，“欲以灭胡平蜀为己任，言论慷慨，形于辞色”（《晋书·庾亮传附庾翼传》）。汉兴六年（公三四三年），庾翼北伐。在大举攻后赵之先，四月遣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伐蜀，发了一道例行公式的檄文，以壮行色。晋军在巴郡打败了守将，没有继续深入。庾翼死，桓温执政，他的官衔是：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温志在立勋于蜀”（《晋书·桓温传》），首先灭汉，再图北伐。

汉可不可以攻取？在东晋朝廷中是有异议的。主张北伐，统一中国的人，就认为对汉战争是可以取胜的。苟安江左，听任胡人贵族屠杀各族人民的人，若惊弓之鸟，不敢翘首西望，

就认为汉不可攻。如象庾亮则认为“蜀甚弱”(《晋书·庾亮传》)，而何充则认为荆州“西邻劲敌”(《晋书·何充传》)。到桓温为荆州刺史时，仍然存在对汉国实力估计不正确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意见。《世说新语·识鉴》说:“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居上游，三峡未易可克。”

《晋书·袁瓌传附子乔传》说:“桓温谋伐蜀，众以为不可，乔劝温曰：夫经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于胸心，然后举无遗算耳。今天下之难，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方胡为弱，将欲除之，先从易者。今泝流万里，经历天险，彼或有备，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绝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战之具，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擒之必矣。……”桓温排除了干扰，接受袁乔的意见，决定伐汉，造作战船，作好了准备，于李势嘉宁元年（东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三四六年）十一月,“帅征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谯王无忌、建武将军袁乔伐蜀，拜表辄行”(《晋书·穆帝纪》)。使袁乔帅二千人为先锋，桓温亲自率领七千余人通过“绝壁天悬，腾波迅急”的三峡，还观看了瞿塘峡中的八阵图遗迹。

由于汉国微弱，守军多缺，得到桓温来伐的消息，李势慌了手足，急忙调集大军抵御。在李势统治下，中外离心，士无斗志，汉国把守东大门的镇东将军李位都不战而降，晋军长驱直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次年二月，桓温的军队到了青衣[61]，李势“遣李福与昝坚等数千人从山阳趣（趋）合水距温”(《晋书·李势载记》)。山阳当是木马山（今双流县南）之

阳，合水就是思蒙水与岷江汇合处，西魏的青衣县在岷江之西，思濛水之南，适当二水汇合处。昝坚等人的任务是要在那里把桓温的军队截住，阻止他继续前进。而昝坚行军与晋军前进走的不同路线，没有找到晋军作战。

桓温在发兵之初，使袁乔领二千人为先锋，益州刺史周抚进督梁州的汉中、巴西、梓潼、阴平四郡军事，各路兵马齐集彭模。彭模就是现在的彭山，离成都只有一百里，步行一天可到。三月，桓温来到，决战时刻到了。如何打？晋军将领在这里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晋书·袁瓌传附子乔传》说："师次彭模，去贼已近，议者欲两道并进，以分贼势。乔曰：今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顾之心，所谓人自为战者也。今分为两军，军力不一，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其甑釜，赍三日粮，胜可必矣。……"

桓温采纳了袁乔的建议，把辎重放下，留参军孙盛、周楚领羸弱守彭模，桓温率步兵轻装前进，进至十里陌。李势在十里陌部署得有军队。昝坚的军队在青衣扑了空，攻彭模又被击溃。这时也退到十里陌。两军展开激战。先锋袁乔在十里陌与汉军"大战，前锋失利，乔军亦退，矢及马首，左右失色。乔因麾而进，声气愈厉，遂大破之，长驱至成都"（同上）。桓温绕开十里陌，从间道趋成都。

晋军逼近成都，李势作最后挣扎，调动所有军队出来抵抗。两军交战于城南的笮桥。刚刚接战，晋军不利，参军龚护战死，军士胆怯，指挥退兵，鼓吏误把退兵鼓打成进军鼓，晋军猛攻，遂大破汉兵。桓温军乘胜前进，直逼城下，放一把火将少城烧了[62]。

汉国完全没有抗拒能力了。李势君臣见大势已去，内心惶惧，拿不定主意，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璩等劝李势投降。李势问侍中冯孚，冯孚回答说:“昔吴汉征蜀，尽诛公孙氏。今晋下书，不赦诸李，虽降，恐无全理（《晋书·李势载记》)。李势便于夜间逃出成都，跑到白水城[63]然后使散骑常侍王幼向桓温递投降书，投降书说:

> “伪嘉宁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阳李势叩头死罪。伏惟大将军节下：先人播流，恃险因寡，窃自汶蜀。势以闇弱，复统末绪，偷安荏苒，未能改图。猥烦朱轩，践冒险阻，将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惭俯愧，精魄飞散，甘受斧锧，以寡军鼓。伏惟大晋，天纲恢弘，泽及四海，恩过阳日。逼迫仓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谨遣私署散骑常侍王幼奉笺以闻，并敕州郡投戈释杖。穷池之鱼，待命漏刻”(《晋书·李势载记》)。

接着，李势舆榇面缚到桓温军门投降。从李特于晋惠永宁元年（公元三〇一年）十月初建流民政权起，至李势投降止，前后六世，共统治四十七年的成·汉政权宣告终结。

桓温送走李势及宗室十余人去建康，并引用汉国司空谯献之为参佐，推荐了拒绝参与李氏政权的谯秀，所谓“举贤旌善，蜀人悦之”(《通鉴·晋纪》)。

李势虽然投降，汉国臣僚有的并不愿臣服东晋。桓温还没有离开成都，汉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平南将军王润、将军隗文等举兵反，各有万余追随者。桓温亲自率兵击邓定，命袁乔击隗文，打败了叛军。桓温命益州刺史周抚镇彭模，斩王誓、王润。

桓温灭汉，提高了他在东晋朝廷中的政治威望。汉国残余势力的叛乱尚未平息，他在成都停留了三十天，振旅回到江陵，牢牢地站住荆州刺史的重位。

四月，邓定、隗文等人据成都。七月，邓定等立故国师、丞相范长生的儿子范贲为帝，利用天师道为组织群众的思想工具，居然也迷惑了一些人，蜀人归从的不少。到永和五年（公元三四九年）四月，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朱焘击杀了范贲，镇压了这次叛乱，肃清了汉国的残余势力。

# 第七章　成·汉政权存在的历史条件

大成政权的版图，只有梁、益、宁三州，在西晋统辖的十九州中，它只占六分之一强，这三州的周围，又都是司马氏政权管辖的区域，也就是说，成·汉政权在司马氏政权包围中生存了四十几年。“卧蹋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封建中央皇权对地方割据政权不能容忍的通俗的深刻的表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皇权是全国统一的标帜。大成政权建立后，司马氏政权（无论西晋或东晋）都没有承认它的合法存在，不时还要派军队“讨伐”，那么，成·汉政权为什么在司马氏政权包围中能够维持四十多年?

## 一　八王之乱导致分裂

自东汉末年，讨董卓的关东联军解体，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以后是三国鼎立，分裂了九十年之后，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全国又归于统一。这次统一的担当者是司马氏集团。

统一既然实现，维持既已出现的统一，必须消灭分裂的基础，否则，统一的局面就难以维持。司马氏集团完成了统一的任务，却没有能够巩固统一，使它长久地传下去。因为，它没有消灭分裂的基础——大土地所有制。

在封建社会里，大土地所有制是封建权力的源泉。大土地所有者是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它本身就要求权力，东汉的历史就是这样。曹魏时期，九品官人法的施行和五等封爵制的恢复，为大土地所有者创造了极为优越的条件，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门阀世族阶层，门阀世族阶层得到特殊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反转来又巩固并发展了大土地所有制，加强了它的经济基础，增大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

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作为一个统一象征的中央皇权必须要有权威。没有权威的皇权，也是形同虚设，便没有能力维持统一的局面。

东汉刚建立的时候，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已经够大了[64]，由于光武、明、章三朝注意加强中央集权制，皇权仍然是名副其实的统一的标帜，维持统一局面达二百年之久。以司马炎为代表的西晋皇权则不然。西晋建立之初，就封了司马氏宗室二十七人为王，功臣十一人为公，诸王多领兵镇守军事要地，这便为“政出多门”铺平了道路。“据方镇总戎兵”和“权戚满朝，威柄不一”（见《晋书·张华传》），就是“政出多门”的体现。晋武帝时，这样的政治格局已经定下来，埋下了后日大乱的根源。

司马炎一死，矛盾就迅速表面化。大乱先从宫廷开始，发难者是惠帝皇后贾南风。继而扩大到皇室，攘成八王之乱。

这场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围绕争夺权位为中心而展开，经历如下六个专政阶段:

一、贾后专政　从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三月，贾后诬杀杨骏（夷三族，株连数千人）开始，到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四月，赵王伦废贾后止。

二、赵王伦专政　废杀贾后之后，赵王伦诛杀异己，树立亲信，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永宁元年（公元三〇一年）正月，赵王伦篡位。三月，齐王冏起兵讨伦，传檄州郡，“征北大将军、成都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颙，常山王乂，豫（冀）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南中郎将、新野公歆，皆举兵应之，众数十万”（《晋书 · 惠帝纪》），大战六十天，死亡十万人。

三、齐王冏专政　永宁元年四月，惠帝复位。六月，以齐王冏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年）十二月，河间王颙上表称，“齐王冏窥窃神器，有无君之心”（《晋书 · 惠帝纪》），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虓同会洛阳，传檄以长沙王乂为内主。齐王冏部将攻乂，放火烧皇宫西门，长沙王乂方面，放火烧齐王府，“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通鉴 · 晋纪》）。连战三天，杀冏，同党皆夷三族，死者二千多人。

四、成都王颖专政　齐王冏败死后，惠帝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成都王颖讨冏之后，归邺，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录尚书事，“悬执朝政，事无巨细，皆就邺咨之”（《晋书 · 成都王颖传》）。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年）八月，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起兵讨乂，惠帝以乂

为都督，帅兵抵御。战斗从八月进行到十月，乂与颖书说：“……今卿复与太尉共起大众，阻兵百万，重围宫城。……自投沟涧，荡平山谷，死者日万，酷痛无罪”（《晋书·长沙王乂传》）。永兴元年（公元三〇四年）正月，东海王越从中逮捕长沙王乂，杀之。死亡六、七万人。

五、河间王颙专政　成都王颖仍然归还邺城。三月，河间王颙表立颖为太弟，作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之后，“（颖）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大失众望”（《晋书·成都王颖传》）。七月，东海王越等挟持惠帝征颖。各方的军队集中在安阳，有十万人。成都王颖派出五万军队抵抗，败东海王越，挟持惠帝入邺城。接着，安北将军王浚与东嬴公司马腾讨成都王颖，颖同惠帝跑回洛阳。“王浚入邺，士众暴掠，死者甚众”（《通鉴·晋纪》）。

惠帝还洛阳，河间王颙部将张方拥兵专朝政。豫州都督，范阳王虓，徐州刺史、东平王楙等上书废成都王颖，并要求张方回长安。“张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同上），十一月，张方劫惠帝往长安，临行，“军人因妻掠后宫，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帴，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同上）。十二月，废成都王颖，诏以河间王颙都督中外诸军事，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

永兴二年（公元三〇五年）七月，东海王越在徐州起兵，声称迎惠帝还洛阳。东海王越累败河间王颙的军队。光熙元年（公元三〇六年）五月，颙等逃出长安，东海王越部将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

六、东海王越专政　六月，惠帝回到洛阳。八月，以太

傅、东海王越录尚书事。十一月，惠帝死。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贾后及诸王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动辄以兵戎相见，每次出动军队几万、几十万。这样剧烈的斗争，前后达十六年之久，死亡的人有几十万，黄河中下游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已故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说："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二九五页）。八王之乱，也消耗了西晋统治者的力量，削弱了自身，西晋统治集团内头脑比较清醒的官僚刘弘指出："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兽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晋书·刘乔传》）。

## 二　南北起义反晋　西晋无力西顾益州

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为权位而展开的残酷厮杀，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促使社会矛盾的激化。给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导致人民起义；统治集团力量的大量内耗，削弱了对全国的控驭能力，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由于混乱纷争造成大批流民，流民又以武装斗争冲击西晋统治。自郝散揭开反晋序幕之后，全国范围内反晋斗争接踵而起，弥漫西晋统治的主要地区。大成政权刚建立不久，匈奴人刘渊在华北建立汉国，汉国直接威胁着西晋的统治。同时南方又爆发了张昌

起义。西晋朝廷忙于对刘渊和张昌以及平定内部官吏的反叛，自然就无力西顾在益州的大成了。

刘渊，匈奴贵族的后代。八王之乱起，匈奴左贤王刘宣说:“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在刘宣等匈奴贵族的拥立下，于惠帝永兴元年十一月称汉王，建元元熙。刘渊即王位后，跟即遣刘曜寇太原，取法氏、屯留、长子、中都。又遣将寇西河，取介休，赶走了并州刺史司马腾。次年，刘渊入都蒲子，河东、平阳两郡属县的垒壁全部投降。永嘉元年，石勒、王弥投奔刘渊。

永兴二年（公元三〇五年）公师藩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间，羯人石勒与汲桑率领官马数百骑投奔。接着败魏郡（治邺，今河南安阳北）太守，攻陷邺城，杀东嬴公司马腾，烧邺城宫室，大掠妇女、珍宝而去。公师藩、汲桑先后败死，石勒遂投刘渊。

王弥，东莱（治掖，今山东掖县）人，家世二千石。惠帝光熙元年（公元三〇六年）三月，东莱惤令刘伯根反，自称惤公，袭临淄。王弥率家僮投刘，刘用他作长史。刘伯根失败，王弥投刘渊，寇掠青、徐、兖、豫四州，诸郡守将纷纷逃跑。

石勒、王弥的加入，大大增强了刘渊对西晋的进攻力量。

在并州方面。并州刺史司马腾被刘渊赶走之后，刘琨继任并州刺史。那时，并州已经残破不堪，刘琨向朝廷陈述他目睹那里的状况说:“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

万，周币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晋书·刘琨传》）。刘琨在艰难的条件下，招集流亡，联合鲜卑段部抗击汉（刘渊）和前赵（刘曜）的进攻。刘琨承受巨大压力，得不到掌握重兵的王浚的支持，愍帝建兴三年（公元三一五年）与石勒战，大败，“一军皆没，并土震骇。”不久并州被前赵占领。石勒又攻陷幽州，杀了王浚。

在冀州、司州方面。石勒是刘渊手下一员悍将，先随刘聪在并州作战，又进入司州，攻魏郡（治邺，今河北磁县南）、顿丘（治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北上攻冀州，有众十余万。“王浚使其将祁弘帅鲜卑段务尘十万骑讨勒，大败勒于飞龙山，死者万计。……（勒）进寇信都（治今河北冀县），害冀州刺史王斌。于是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自洛阳率众讨勒……勒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裴宪弃其军奔于淮南，王堪退堡仓垣……（勒）渡河攻广宗、清河、平原、阳平诸县，降勒者九万余口。复南济河，荥阳太守裴纯奔于建业”（《晋书·石勒载记》）。黄河以北大片土地被汉国占领。

洛阳、长安保卫战与怀愍被俘。刘渊在世时，他曾经两次派军攻击洛阳，都被击退。怀帝永嘉四年（公元三一〇年）十月，汉帝刘聪遣大军攻洛阳，形势非常紧张。西晋朝廷大权掌握者、太傅司马越遣使征各地兵马入援京师，结果没有到洛阳的。十一月，司马越帅甲士四万出洛阳进讨石勒，屯军于项（今河南沈丘）。在这个紧急关头，司马越与青州史苟晞的矛盾又表面化，苟晞“移檄诸州，……陈越罪状”（《通鉴·晋纪》）。怀帝也不满于司马越专权，密赐苟晞手诏，使他讨伐司马越。在“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

结寡深”（《晋书·东海王越传》）的景况下，司马越忧惧成病，于永嘉五年（公元三一一年）三月，死于项城。石勒追赶至苦县，大败晋兵，纵骑兵围射，将士十余万人全部覆没，无一人幸免。

永嘉五年五月，刘聪使呼延晏将兵二万七千寇洛阳，在洛阳城外十二次打败晋兵。刘曜、石勒、王弥引军前来会合。六月，入洛阳，俘虏怀帝。“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后妃，吴王晏、竟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晋书·怀帝纪》），怀帝被送往平阳，受尽凌辱后而“遇弑”。

怀帝死讯传出，晋臣又在长安立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通鉴·晋纪》）。愍帝即位后，刘聪又派兵进攻长安，双方在长安附近展开拉锯战，至愍帝建兴四年（公元三一六年）八月，刘曜进逼长安，内外隔绝，城内无粮，米每斗直金二两，人相食。至十一月，西晋的最后一个皇帝——愍帝说：“今窘厄如此，外无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将士暴离斯酷，今欲闻城未陷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晋书·愍帝纪》），十一月，愍帝出降，西晋统治结束。

与汉国势力发展的同时，南方爆发了张昌起义，接着又发生了陈敏，钱琀叛乱，王如起义，杜弢起义，胡亢、杜曾叛乱，这些事件差不多前后相连接，直到西晋灭亡；这些事件又主要发生在荆州。荆州西边与梁、益二州邻接，若二州有反抗封建政权的武装斗争，荆州便有责任派兵救援。当李

特起兵，第一次进入成都少城的时候，西晋朝廷派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率水军三万入蜀援救罗尚。宋岱之后，新野王司马歆都督荆州诸军事，西晋朝廷发“壬午诏”，调发“武勇赴益土”镇压李流（《晋书·张昌传》）。这个时候，荆州地区的矛盾也不少。荆州镇将司马歆“为政严刻，蛮夷并怨”（《晋书·宣五王、新野王歆传》）。李特起兵于蜀中，给备受苛政压迫的江夏少数民族以启发，义阳蛮张昌“潜遁半年，聚众数千人”（《晋书·张昌传》），准备起义。调发去益州镇压李流的“壬午兵”不愿前往，便“屯聚而为劫掠”（同上）。太安二年，江夏郡丰收，在此就食的流民有几千。这年五月张昌在江夏郡安陆县石岩山屯聚，流民和“壬午兵”多投张昌，便爆发了江夏起义。“江沔间一时猋起，竖牙旗，鸣鼓角从应昌，旬月之间，众至三万”（《晋书·张昌传》）。起义形势发展迅速，势头很猛，征南将军司马歆惊呼：“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同上），请求朝廷命令诸军三路救助。

张昌别帅石冰攻打扬州，败刺史陈徽，诸郡尽下，又攻江州。石冰别将陈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临淮人封云起兵响应，攻徐州。于是荆、江、徐、扬、豫五州的许多郡县都为起义者所据，新任了州郡长官。

在荆州战斗的张昌遭到荆州刺史刘弘、豫州刺史刘乔的强大进攻，前后杀起义者数万，张昌逃走，部众投降，朝廷恢复了荆州的统治。

石冰在扬州取得很大的胜利，土著豪族地主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秘密组织地方武装，镇压起义兵。出谋的是

义兴郡豪族地主周玘，推前吴兴太守吴郡顾秘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65]，传檄州郡，杀石冰任命的将吏，于是江东地主纷纷举兵响应周玘。石冰北走徐州依封云，陈敏回军攻徐州，封云司马杀石冰与封云向陈敏投降。徐、扬二州平，时在永兴元年（公元三〇四年）三月。这年秋天，把张昌也擒住了，传首京师，同党并夷三族。

陈敏在镇压石冰之后，与丹阳世族地主甘卓合谋，割据江东，永兴二年（公元三〇五年）十二月，自称楚公，用江南世族地主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阳内史，及郡守、将军四十多人“带甲数万，舳舻山积”。

周玘没有接受陈敏委任，秘密报告镇东将军刘准，请求派兵，自己在内响应，原先接受过陈敏官号的江东地主也倒戈，在官兵与土著地主军队的合力攻势下，杀了陈敏，传首洛阳。时惟永嘉元年（公元三〇七年）三月。

陈敏割据江东的时候，吴兴人钱增也起兵讨伐，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建威将军。永嘉三年（公元三〇九年），司马越征调钱琻带领所属部队到洛阳，走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传来刘聪攻洛阳的消息，钱琻畏缩不敢前进，朝廷“促以军期”，钱琻便称兵反叛，焚烧粮仓，自称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吴帝后代孙充立为吴王。镇守建康的司马睿派兵进讨，以兵少不敢出战。义兴豪族地主周玘组织地方武装联同正规军一起进攻，斩琻，传首建康。

集中在南阳的雍州流民，西晋朝廷下诏强令归还乡里。雍州经受多次战乱，土地荒芜，都不愿回去。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越遣兵押送，促期令发。永嘉四年（公元三一〇年）

九月，王如秘密组织壮士，于夜间袭击山、杜军队，并把他们打败。

王如领导的流民军在沔、汉地区扩展，于是南安庞寔、(《怀帝纪》作“新平人庞定”。——引者)，冯翊严嶷、京兆侯脱聚众攻城镇，杀令长，响应王如，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称藩于汉。

流落在荆湘的巴蜀流民，“备尝荼毒”，“为归百姓所侵苦，并怀怨恨”(《晋书·杜弢传》)，蜀人李骧聚在乐乡起义。南平太守应詹马上派兵讨伐。荆州刺史王澄又派兵进攻。李骧力量单薄，意志也不坚定，便投降了。

永嘉五年春天，停驻在湘州的巴蜀流民有四、五万家。湘州刺史荀眺想把他们统统杀掉。于是，这四、五万家流民怒吼了，“一时俱反，”推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横扫荆、湘二州许多郡县。王澄累次被打败，镇守建业的司马睿派周顗代王澄。周顗刚到州，建平流人起义，响应杜弢，周顗狼狈失据。征讨大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共同进击杜弢，“水陆十万。”

从建兴元年（公元三一三年）八月至建兴三年二月，近两年时间，杜弢率领的流民军与官兵前后数十战，流民军将士在战斗中阵亡不少，到六月间，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西晋末年的社会矛盾与斗争错综复杂。这些反晋力量，也包含着复杂的内涵。从民族方面说，有少数民族，有汉族；从阶级方面说，主要是劳动人民，也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还有晋朝的大小官吏，从性质方面说，有人民起义，有野心家

叛乱；特别是流民群的阶级成份复杂，对流民起义的性质、前途有着重大的影响。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晋后期的十多年中，南北各种反晋力量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它们的矛头指向西晋统治。匈奴汉国一出现就给西晋以巨大的军事压力，尽管西晋方面作出很大努力，也不能抗御，逐步南退。在南方，自张昌起义之后，荆州地区接二连三爆发了流民起义与野心家叛乱，使得荆、扬一带的镇将、州、郡疲于奔命。所以，李特、李流在蜀中起兵之初，朝廷还能从关中、荆州、梁州乃至宁州派遣军队，前往蜀中镇压，张昌起义之后，各方都很紧张，分不出军队大举进攻，李流、李雄才能赶走罗尚，清除西晋在梁、益的地方官吏和军队，建立起政权，并使它稳定下来。

## 三　东晋初叛乱屡起　无法调兵伐戍

匈奴汉国的威胁，使西晋统治者预感继续在中原立脚的困难，有经营江南的必要，作退一步设想。怀帝永嘉元年（公元三〇七年）七月，朝廷以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九月，司马睿到达镇所。此时，陈敏、钱增之乱才平定下来。中原世族随司马睿渡江的有百家。南来世族都与司马睿合流，想在江南建立政权，保护他们的利益。江南地主还在观望，司马睿来到建业，土著地主都不理睬。同时，南方地主阶级的思想正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流民进入江南；爆发过流民起义，心有余悸；另一

方，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南下，咄咄逼人。司马睿到达建业的时候，已经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故在王敦、王导兄弟的斡旋下，江南地主迅速就向司马睿靠拢。司马睿得到南北地主阶级的支持，在建康[66]重建了司马氏统治，史称东晋，司马睿即东晋元帝。

司马睿进入建康（公元三〇七年）到东晋正式建立（公元三一八年）的十年间，他忙于经营江南，安抚内部，无暇北望与西顾[67]。

西晋灭亡后，前赵分裂，后赵继起，前秦、前燕与鲜卑拓跋部勃兴，彼此间的战争更为频繁与激烈，减少了对偏安江左的东晋进攻的可能性，在暂时和平的环境里，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新的矛盾，永昌元年（公元三二二年）爆发了王敦之乱。

司马睿能够在江南建立东晋，无疑是南北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与支持，但是北方第一流世族王敦、王导兄弟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有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话。司马睿称帝后，以王敦为大将军、荆州牧，握重兵，守荆州；王导为骠骑将军、侍中、录尚书，领中书监；军政大权都由王氏兄弟掌握。王敦“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众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晋书 · 王敦传》)。

元帝不满意王氏兄弟专权，乃引用刘隗、刁协、戴渊为心腹，在大兴四年（公元三二一年）五月，下了一道诏书：

> “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之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

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草诏者的用心是很深的。不管怎么说，免扬州奴婢为僮客，就是要组织一支新军，就是用这支新军防备王敦。接着，七月，以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今江苏清江市西）。这样的人事部署，也显然是针对王敦的。

永昌元年正月，王敦举兵于武昌，以诛刘隗、刁协为名，王敦党与沈充起兵响应。“三月，徵征西将军戴若思、镇北将军刘隗还卫京师。以司空王导为前锋大都督，以戴若思为骠骑将军，丹阳诸郡皆加军号。……以太子右卫率周莚行冠军将军，统兵三千讨沈充。……刘隗军于金城，右将军周札守石头，帝亲被甲徇六师于郊外。遣平南将军陶侃领江州，安南将军甘卓领荆州，各帅所统以蹑敦后”（《晋书·元帝纪》）。四月，王敦进入建康石头城，杀周顗、戴若思，刁协出逃，为人所杀，刘隗奔投石勒。王敦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武昌郡公，邑万户。他根本不把元帝放在眼里，拥军石头城，不朝皇帝，任意改换百官及军镇。不久，王敦回到武昌。十一月，元帝忧愤而死。

王敦专政以后，为所欲为，树立亲党，占据重要部门。明帝太宁元年（公元三二三年）四月，王敦从武昌移镇于湖（属扬州丹阳郡，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王敦的举动，皇帝和臣僚都看得清楚，再次逼宫的事迫在眼前，于是明帝积极部署力量，准备反击。

七月，王敦病势沈重，仍然贼心不死，他要“及吾尚存，

悉众而下，万一侥幸”（《晋书·王敦传》），以他的哥哥王含为元帅，统率钱凤、周抚、邓狱等水陆军五万，进到秦淮河南边。建康守军展开了保卫战，各地纷纷起义讨伐王敦党羽，宗正卿虞潭、前安东将军刘超、宣城内史钟雅等起兵讨沈充，义兴人周蹇杀王敦所署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逐王敦所署太守，刘遐、苏峻等率领精兵赶到建康救援，诸军奋力激战。王敦死的消息传出，叛军瓦解，王含烧营逃跑。

王敦之乱平息才四年，又于成帝咸和二年（公元三二七年）十一月爆发了豫州刺史祖约及历阳内史苏峻的联合叛乱。

苏峻祖约的叛军打败了朝廷的军队，在建康城外，“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遂陷宫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驱役百官”……裸剥士女……哀号之声震动内外。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废（《通鉴》作费，于义为长——引者）之”（《晋书·苏峻传》），庾亮逃走。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苏峻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改易官司，置其亲党，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同上）。

苏峻叛乱，江州刺史温峤得到消息，便率军救援建康，屯军寻阳，派督护王愆期等为前锋率水师赴难。

咸和三年（公元三二八年）二月，苏峻陷建康，庾亮逃到寻阳。温峤遣使邀荆州刺史陶侃共赴国难，组成联军，“戎卒六万，旌旗七百余里，征鼓之声震于百里，直指石头……”（《晋书·温峤传》）

王导秘密以庾太后的名义要求三吴官吏组织义军救护困在建康的皇帝。

这时，祖约尚在历阳，与占据建康的苏峻首尾相应。

义军分三方面作战：第一方面，以主力攻建康；第二方面，对付在历阳的祖约，第三方面，即三吴义军反击苏峻派出进攻三吴的叛军。

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到咸和四年（公元三二九年）二月，才彻底平息了叛乱。“及贼平，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晋书·王导传》)，至使有人提出迁都。

一次大规摸的内乱，所造成的损失是相当巨大的，需要若干年的努力，才能得到恢复。王敦、苏峻那样大规模的叛乱，要消耗多少人力、财力，给人民、国家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

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的时候，李雄在梁、益二州的地位已经巩固，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并有了发展。玉衡四年（愍帝建兴二年，公元三一四年），李雄新定赋调制度，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开始向宁州扩展。东晋世族地主内部的矛盾与斗争，自顾不暇，那里还有力量去进攻大成，因而，李雄得专力内部建设，并使大成疆域扩大到梁、益、宁三州，巩固了它的统治。

## 四　大成施政措施与四川地理环境的作用

除了上述诸种政治条件之外，李特的“约法三章”得到了蜀人支持；李雄实行“宽和政役”、减轻赋调，使得人心稳定；加强防御以及四川的地理环境的优越与特殊，也是成·汉政权

能够存在的重要原因。

所谓地理环境，即环绕着社会的自然界，它是“社会物质生活所必要和经常的条件之一，而且无疑是影响到社会底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1 年，莫斯科中文版，150 页）自然界的气候（温、寒、热）、土壤（肥沃、贫瘠）、河流（通航、灌溉、水产）、树木、矿藏（丰富、寡少）、山脉（出产、险要）……等等都会对社会发生影响。当然，自然界对社会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自然界对社会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西方的社会学、历史学中的地理学派荒谬地认为地理环境——气候、土壤、地势、动植物界的特性——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的生理或心理，决定人们的嗜好、气质、坚定性、持久力，并通过这些特质决定整个社会制度。这当然是错误的。中国古代也有从不同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西汉末年，蜀郡功曹李熊对公孙述曾经说过如下一段话：

> “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银铜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涂，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余里，战士不下百万众：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也。”(《东观汉记·公孙述载记》)

李熊这段话举出了两点：1. 蜀地富庶；2. 地势险要。他认为，凭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可以在蜀地建立割据政权。李熊所举两点，反映了古代四川地理环境的优越条件。

蜀地的经济发展比较早，与关中也有贸易关系。太史公说“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史记·货殖列传》）在秦统一巴、蜀之后，此区经济更有长足进步，与关中地区的联系也密切了。成都不再是仅仅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封建城堡，而且有重要的经济地位。成都市[68]成了巴蜀货物的集散地，通过千里栈道，把巴蜀货物运销关中[69]。汉代的蜀布、蜀刀、蜀镜、蜀杯、釦器，驰誉全国，邛杖、枸酱、漆器行销国外。西汉时，成都的户数有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仅次于京师长安，为全国第二大都市。汉武帝时，僰道令因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没有完成任务而被杀，将行刑，他说：“忝官蜀土，恨不见成都市！”可见成都市扬名远近，为人们所向往。此区的大工商业者也不乏其人[70]。他们有巨额的财产，过着豪华的生活。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对大工商业者的生活作如下的描述：

> “秦惠王、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财，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嫁娶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死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疑是牺之误——引者）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孙家千数，程郑各（当作亦——引者）八百人，而郄公从禽，巷无行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

秦汉时期巴蜀经济的长足发展，为此区以后经济进一步繁荣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蜀汉时，广汉太守夏侯纂问功曹古朴说：

“贵州(益州——引者)，养生之具，实绝余州”(《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可见益州的物产在全国算是头等的。西晋初年的大文学家左思所作《蜀都赋》，不仅描写成都的富有，而且还记述了全蜀各地的出产，应有尽有，“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

巴蜀地区的经济在很早就这样发达，因为，气候温和，水利灌溉方便，矿藏丰富，在广大劳动人民长期辛勤劳动下，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使巴蜀经济实力雄强，号称天府之国。有这样的经济条件，首先能养活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包括皇室、官吏和维护其统治的军队)，同时，可以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公孙述、刘备父子都在李氏之先利用了巴蜀富饶的资源，做为他们立国的基础。当其他们建立起割据政权之后，它依靠本区的丰富物产，闭关自守，不必与外州通商，便可以自给自足，这正是封建经济的根本属性。大成政权的统治者当然也接受了这份大自然恩赐的礼物，作为立国的基本条件。李雄“宽和政役”，注意调整阶级关系，发展了生产，“年丰谷登”、“民多富实”，统治区内安定。这才是成·汉政权能够存在的最根本之点。

李熊所举的第二点，即蜀地的地势险要，从军事观点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利于防守。四川地形确实具有这样的特点。

四川的地形，主要分为高原区和盆地区两部分。西部是高原区，它是青康藏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东部是盆地区，是我国著名的四川盆地，基本上就是西晋的梁、益二州之地，成·汉分置为梁、益、荆、安四州。

盆地四周环绕着高山：西部为邛崃山，北部为大巴山，南部为云贵高原的延续部分，东部为巫山山脉。在古代，进出此区的要道有二：北边为石牛道，从现在陕西勉县西南行，趋七盘岭入四川境，经朝天驿趋剑门关，是联系汉中与巴蜀的交通孔道。江道，即从川东的长江三峡出入，东下湖北，是四川与长江下游联络的水上通道。历代征伐四川割据政权都是从这两条道路进军[71]的。所以，在四川建立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非常重视这两方的防务。大成建立后，一直注意北面防务，尽力与晋的梁州刺史争夺汉中。大成也设置梁州刺史，镇涪县或晋寿，管理北面的军事。汉中归入大成版图，“遂置守宰，戍南郑。”（《晋书·李期载记》）在东面，设立荆州刺史和征东、镇东将军，驻军江州或巴东，镇守东大门。自从宁州归入大成版图，把南面防务远推到交、广二州的边缘。在武器只有刀矛一类，箭算远攻武器的古代，象四川这样的险阻地势，是有利于防守的良好条件。从战术的角度看问题，“地利”在一次攻守战斗中的意义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历史发展，国家盛衰看问题，地利便微不足道，也是不足恃的，魏武侯在西河中流与吴起的对话已经认识到“在德不在险，”那是很有见地的。

成·汉政权的产生，是由西晋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皇权衰落而引起。在既已出现大成、汉国和西晋三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西晋受到南北反晋力量的不断冲击，东晋初年又发生内部叛乱，使得它们没有力量顾及大成，大成统治者又利用了四川的自然优势，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成政权得以存在，而且创造了它的黄金时代。李班以后，成·汉又不

断发生争夺皇位的斗争，加上暴政，丧失了民心，它的统治就难以维持下去了。地理环境没有变，而政治条件变化了。马列主义教导我们：“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彼此关联，互相制约，那末在估计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运动时，当然也就不可如历史家常作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是要从这个制度和这社会运动所由产生并与其相联结的那些条件出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1 年莫斯科中文版，139 页)。

## 注　释

[1] 民族一词，我们从广义的角度使用它。马克思说：“‘民族’这个称号适应于许多印第安部落，因为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却独特地拥有一定的方言和地域。”(《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96 页。)

[2] 《太平御览》“乐部”引《三巴记》云：“阆中有渝水，賨民锐气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使乐人习之，故名巴渝舞。”《华阳国志·巴志》云：“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续汉书·郡国志》亦云：“阆中有俞水。”据此，阆中渝水即今嘉陵江。《读史方舆纪要》保宁府阆中县嘉陵江条下云：“亦曰汉水，亦曰阆水，亦曰渝水，亦曰巴水，皆嘉陵之异名也。”

[3] 《华阳国志·巴志》说：“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又《太平寰宇记》渠州流江县下说：“故賨城在县东北七十四里，古賨国都也。”都没有说明古賨城建于何时。

[4] 邓少琴：《巴史新探》。1959 年 10 月印，单行本。

[5] 夷水又名盐水、清江，现在还叫清江，在湖北境内。但古代“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江”(《水经》)。即首受于长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水经注·夷水篇》)。

[6] 《太平寰宇记》达州宣汉井场条说：“其场风俗，男女不耕蚕货卖，用杂物代钱。祖称白虎，死葬不选坟墓，设斋不以亡辰，虽三年晦朔不飨。习性旷硬，语无实词，皆风土使之然。”廪君蛮以白虎为图腾，祠白虎。宣汉井场的这部分人“祖称白虎”，疑是廪君苗裔，至宋代还保留一些原有风俗。

[7] 《汉书·艺文志》有《世本》十五篇。原注说：“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汉宋衷作注。《世本》可能在五代时亡佚，清人有多种辑本。

[8] 武落锺离山或称巫落锺离山、武落山。《太平寰宇记》峡州长阳县下说：“武落山中（中字衍——引者）在县西北七十八里，木廪君所出也。”

[9] 白虎是少见的。星相学和古老的方位，常用白虎这个名词，应该说是现实的反映。秦昭王时，白虎为害，汉宣帝神爵元年三月诏“南郡获白虎”（《汉书·宣帝纪》），可见白虎确实存在。徐世挺：《动物身上的“钟表”》白虎条说：“在印度文德希亚普拉德什邦的梵列地方，有一种老虎毛色洁白如雪，眼睛象红宝石。”科学家认为，一切皮毛有色的动物，都可能生下纯白的个体，这是患的色素缺乏症。”动物学上称为白变现象。我国湖北神农架也有许多白变动物。

[10] 《华阳国志·巴志》云：秦精等射杀了白虎，“秦王嘉之。……欲如约，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秦时称賨人为夷，而不称賨。

[11] 《说文》：“弜，彊也，重也，其两切。”段玉裁注：“重，当作緟。”緟，《说文》：“增益也。真容切。”弜即两张弓相重叠。段玉裁说：“重弓者，彊之意也。”

[12] 战国时，秦与賨人约，有“顷田不租”（《华阳国志·巴志》）的话。

[13] 《华阳国志·巴志》作范目，《晋书·礼乐志》作范因。

[14] 此本《风俗通》及《华阳国志》，与《史记》、《汉书》记此事略有不同。《汉书·高帝纪》说：元年（公元前二〇二年）“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汉王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还者。韩信为治粟都尉，亦亡去。肖何追还之，因荐于汉王曰：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于是汉王齐（斋）戒设坛场，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韩信回答说：“……‘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诛？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而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其降二十余万人，唯独邯、欣、翳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于骨髓，今楚以强盛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亡（无）所害，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耳，秦民亡（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户知之，王失职之蜀，民亡（无）不恨者。今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书·韩信列传》）。据此，定策灭三秦王的是韩信而不是范目。賨人七姓不是定三秦的唯一力量，也不是主力。

[15] 《华阳国志·蜀志》云：“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一州称望。”

[16]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鹖冠子》一篇。原注说：“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应劭是一个学识渊博、著作很多的人，他不会不知班固所记，或应劭自有根据。

[17] 《文选》李善注引傅畅《晋诸公赞》说：“司马伦字子彝，咸熙中封赵王，进征西假节，都督雍·梁·晋（疑是秦之误——引者）诸军事。伦诛羌大酋数十人，胡遂反。”

[18] 潘岳：《关中诗》：“哀此黎元，无罪无辜，肝脑涂地，白骨交衢。……俾我晋民，化为狄俘。”

[19] 《汉书·高帝纪》：楚汉相争时，“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20] 此据《晋书·李特载记》。《华阳国志·大同志》云：六郡流民“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诏书不听入蜀，益州勅关禁之，而户曹李苾开关放入蜀……。”依此，流民入蜀是李苾擅自开关放行的，果真是那样，必然要追究责任。《载记》说：“流人既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苾至汉中，受流人货赂，反为表曰：……朝廷从之。”当以《载记》为是。

[21] 《太平寰宇记》剑州普成县下说：氐陌山在普成县（治今剑阁县南）西三十五里。旧《图经》云：“晋太康中（太康当是元康之误——引者），关西离乱，武都氐人流离入蜀，耕凿此山，遂成陌，因名氐陌山。”

[22] 成都城是在秦灭蜀之后筑起来的。《华阳国志·蜀志》说：周回十二里，高七丈。”成都又分为太城与少城两部分。太城即大城，

少城即小城。李膺《益州记》云：少城“与大城俱筑，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成之西墉。”晋时，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或成都内史治少城。

[23] 《华阳国志·大同志》云：“汶山兴乐县黄石北地卢水胡成豚坚、安角、成明石等与广柔平康文降刘紫利羌有仇，遂与蛲蛔羌郅逢等数千骑劫县令，求助紫利。太守杨邠挞豚坚而降其余类。”这次汶山羌战事，《晋书》、《通鉴》都没有记载。而《晋书·李流载记》有李庠参与平羌战事，以功受封。元康八、九年都有对羌的战争，只有杨邠挞杀成豚坚一次，取得胜利，故李庠以功受封当是由参加这次战争而取得。

[24] “蜀郡太守耿滕”有时又称“成都内史耿滕。”《晋书·职官志》：“郡皆置太守，……。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太守与内史的职掌、品位都一样，只是一在郡一在王国，也都由朝廷委任。蜀郡改成都国，在“太康八年，武帝子成都王颖受封，以蜀郡、广汉、犍为、汶山十万户为王国，易蜀郡太守为成都内史”(《华阳国志·大同志》)。惠帝时，益州为流民军占领，“又割南郡之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别立丰都，合四县置成都郡，为成都王颖国，居华容”(《晋书·地理志》) 尽管成都王国已迁往荆州，旧王国已不存在，有时仍称成都内史，并无实质区别。

[25] 东三郡隘地，指魏兴、上庸、新城三郡。《华阳国志·汉中志》云：“魏兴、上庸、新城三郡，汉中所分也，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蜀时为魏，属荆州。晋元康六年，始还梁州。山水艰阻，有黄金、子午、马聪、建鼓之阻，又有作道——九君搏土作人处……。”

[26] 《通鉴·考异》云：“州郡俱治成都，不容战于广汉。”司马光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或许耿滕送传诏人到广汉，赵廞怕耿滕向传诏人继续揭露他的阴谋，而派人追到广汉，故有广汉宣化亭的劫杀事件。不管怎样，赵廞使人“劫滕”当是事实。

[27] 南安县，西晋属犍为郡，县治今乐山。《嘉庆一统志》云：“鱼涪津在夹江县西。建武十二年，吴汉破公孙述将魏党于鱼涪津。《郡国志》，南安有鱼涪津。《蜀都赋》注，津广数百步，在县北三十里，临大江。旧《志》，在今县（即夹江县——引者）西三十里。”桂馥认为鱼涪津乃鱼脂津之讹。《札朴》鱼泣津条云：“《续汉·郡国志》，犍为南安有鱼泣津。《范书·吴汉传》，汉与公孙述将战于鱼涪津。案：泣、涪皆误，当作脂。

《说文》，鮨，鱼脂腦也，出蜀中。”鱼涪津作鱼凫津也是附会。

[28] 此有误。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师事谯周。少时仕蜀为郎。入晋为太子洗马，除温令，迁汉中太守。武帝赐饯东堂，令密赋诗，末章有“官中无人，不如归田”等语而被免官，归家一年卒。此李密在晋武帝时已死，也没有作过犍为太守。李密或作李宓。作犍为太守的是李苾，字叔平，广汉郡郪县人，“为历城令，果作成都（令），迁犍为太守”（《华阳国志·后贤志·李毅传》）。李苾作犍为太守是西晋朝廷任命的。在赵廞组织益州牧政府时，“徙犍为太守李庠为威寇将军”（《华阳国志·大同志》）。赵廞杀李庠之后，赵廞“遣长史费远、犍为太守苾、督护常俊督万余人断北道”（《晋书·李特载记》），罗尚到益州后，永宁元年十月，流民军进围广汉郡雒城，“尚复遣犍为太守李苾……助（辛）冉”（《大同志》），流民军攻下雒城，阎式写信给罗尚，其中有“李叔平才经廊庙，无将帅之气，讨羸之羌谓可长尔，……今叔平长逝”等语，是犍为太守当是李苾不是密，而且李苾也没有被赵廞杀掉。

[29] 张微即张徵。《华阳国志·后贤志，寿良传》云：“良少与犍为张徵、费缉并知名。”又云：“徵字建兴，张翼子也，笃志好学，官至广汉太守。”

[30] 此据《晋书·李特载记》，《华阳国志》作十余人。

[31] 嘉庆《汉州志》“山川”云：“石亭江，治东二十里，雒水正流也。源自什邡县来。按刘焉治绵竹时，凿时累亭以镇雒水，故以名江。《晋书》，蜀郡太守李苾遣督护常俊、长史费远督万余人断北道（见《晋书·李特载记》，此引文有小误——引者），屯于石亭，以拒李特，即此。今北岸曰大汉镇，南岸曰小汉镇。”

[32] 此据《载记》。《通鉴》亦为七千。而《华阳国志》则言“特等相合得七百余人。”以七百人当万人，虽用火攻，也嫌太少。况且紧接着就是进攻成都的战斗，七百人何以胜任？当以《载记》为是。

[33] 《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裴注引《英雄记》云：“先是，南阳、三辅流人入益州数万家，（刘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

[34] 楚灵王筑起了陈、蔡，不羹三座城，打算使他的幼弟弃疾为蔡公，因此楚灵王问他的臣下申无宇，申无宇回答说：“……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羁不在内……。”（《左传》昭公十一年）杜预注：“上古金、木、水、火、土谓之五官……末世随事施职，是以官无常数。今无宇称习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长，专盛过

节，则不可居边；细弱不胜任，亦不可居朝廷。”所谓五大，指：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公卿。因为“五官之长，其人太大，专盛过节，则不可居边城，以陵本国也”（孔颖达语）。

[35] 《晋书·李特载记》云：罗尚督七千余人入蜀。”《华阳国志·大同志》云：“惠帝因拜尚平西将军、假节、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给卫节兵一千，梁州兵二千，配上庸都尉义部（旧校：当作歆）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罗尚又表请牙门将王敦兵七千余人入蜀。”据此合计为一万一千多人。此从《华阳国志》。

[36] 骑督，胡三省说：“督骑兵。”即监管骑兵的军官。骑督也在将军之列。《晋书·朱伺传》云：“陈敏作乱……。敏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领骑督。时西阳夷贼抄掠江夏，太守杨珉（《怀纪》作杨珉，《石勒载记》作杨岠），每请督将议距贼之计，伺独不言。珉曰：朱将军何以不言？……。”

[37] 《晋书·李特载记》：“于是（李特领流民军）进攻（辛）冉于广汉。……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阳。”此广汉指广汉郡，当时辛冉为广汉太守，郡治雒县，县治今广汉县北。从绵竹攻雒，近在咫尺，朝发午至。李特围广汉，“（罗）尚复遣犍为太守李苾、长史费远助冉，不能克。冉托罪于绵竹令南郡岐苞，斩之，而溃围攻德阳。”（《华阳国志·大同志》）辛冉从广汉突围奔往哪里，两书记载有异。新标点本《晋书》《校勘记》认为走德阳为是。《晋书斠注》引《读史举正》曰：“江阳，《通鉴》德阳为是。德阳属广汉，特攻冉于广汉，就近出奔耳。”西晋德阳县属广汉郡，县治今遂宁，从雒至德阳，不算就近。值得注意的是：辛冉在雒县战败之后，再也不见他在李特与罗尚控制区内活动，很可能，他从雒县突围，顺沱江东下，至江阳（今泸州市），再下长江，到荆州投奔刘弘去了。不久之后，阎式与罗尚书说：“今辛冉奴亡，叔平（犍为太守李苾长逝。”《晋书·刘弘传》：“时天下大乱，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前广汉太守辛冉说弘以纵横之事，弘大怒，斩之。”据此推测，当以作江阳或江陵为是。

[38] 朱提，西汉时为县，属犍为郡，后汉置犍为属国，都尉治朱提。朱提县治今云南昭通。建安中置朱提郡。西晋朱提郡统五县，治朱提。《汉书》颜师古注引苏林《汉书音义》曰：“朱音铢，提音时，北方人名匕曰匙。”何超《晋书音义》曰：“上音殊，下上支反。”这样音读，未说明理由。向达云：“昭通出建安（当是建初，系排字错误——引者）八年

洗，文曰‘建初八年朱提造作。’提从木不从手。从木之椃，《集韵》作常支切，音匙。是朱提本应作朱椃，作朱提者后来之讹耳”（《蛮书校注》第二八页）。《金石索》金索杂器之属有“汉元建朱提洗”二，“汉永和朱提洗”一，“汉汉安朱提堂狼洗”一，它们的铭文朱提都作朱提。

[39] 耐，刑名。陈树德云：“汉制，四岁刑至二岁刑，统称为耐罪。《史记·淮南王安传》注，苏林曰，二岁以上为耐，耐能任其罪。观《功臣表》朝阳候华当耏为鬼薪，深泽候赵修有，耏为司寇，可证也。耐或作耏，《说文》耏字下段注云，耐之罪轻于髡，髡者剔发也，不剔其发，仅去须鬓，是曰耐，亦曰完，谓之完者，言其发也。《高帝纪》注应劭曰轻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鬓，故曰耏，古耐字从彡，发肤之意也。杜林以为法度之字皆从寸，后改如是。……《唐六典》载晋刑制二岁以上为耐罪，则晋时犹沿此制”（《九朝律考》，第四五页，中华书局，1963 年）。

[40] 《华阳国志·南中志》云：“与夷为姓（顾校：当作婚）日遑耶。”

[41] 太康三年废宁州改南夷校尉，太安元年，“部永昌从事江阳孙辨上南中形势，七郡斗绝，晋弱夷强，加其土屈塞，应复宁州以相镇慰。冬十一月丙戌诏书，复宁州，增统牂柯、益州、朱提，合七郡……”（《华阳国志·南中志》）。《晋书·地理志》，复宁州在太安二年。

[42] 涪县，治今绵阳市东。《晋书·李流载记》云：“时宋岱水军三万次垫江，前锋孙阜破德阳，获特所置守将骞（当是蹇之误——引者）硕，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县。”涪陵县属涪陵郡，当时战争在德阳（今遂宁）进行，涪陵又不是流民军控制地盘，故没有退屯涪陵县的可能。《华阳国志》：“……太守任藏径至涪。”故此涪陵县是涪县之误。

[43] 陆修静《道门科略》云：“天师立治置职，犹阳官郡县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著籍，各有所属。令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一年三会，民各投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喧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勑大小，务共奉行。”这虽是刘宋时道门规则，比晋时有发展，西晋时尚无这样道教科律，观此可知天师道对教民有一定的管理办法。

[44] 鈇安南。

[45] 《华阳国志·后贤志·侯馥传》云：李恭“生虏馥，送雄，雄

下廷尉……”是大成设有此官。

[46] 太康中，晋武帝子司马迪封汉王，改汉中郡为汉国。

[47] 此涪城即涪县，不是涪城县。《水经注》:“高帝六年（前二〇一年），置广汉郡于乘乡，领县十三，涪县与焉。”因城外有涪江得名，涪县故城在今绵阳市的涪江东岸的第一山下。晋属梓潼郡。此县位扼冲要，古时为军事重镇，蜀汉的大将军镇守于此。大司马蒋琬上疏说：“涪，水陆四通，惟急是赴，东北有虞，应之不难”（《三国志·蜀书·蒋琬传》）。大成的梁州刺史也镇守涪县。

[48] 三府指平西将军府、益州刺史府、西夷校尉府。

[49] 《晋书·王逊传》云：“先是，越嶲太守李钊为李雄所执，自蜀逃归，逊复以钊为越嶲太守。”

[50] 此温水绝非盘江。一、从进军路线看，首先两军接战在台登，大成军获胜，沿孙水而下，攻越嶲，即攻越嶲治邛都，不及温水。二，此温水即邛都附近的温泉。《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晋宁郡滇池县“亦有温泉，如越嶲温水。”又《蜀志》云：邛都县“有温泉穴，冬夏热，其温可汤（烫）鸡豚，下流治病。”故此温水即邛都附近的一处温泉。

[51] 王载是晋故宁刺史李毅的女婿。李毅女“秀初适汉嘉太守广汉王载。载将家避地在南，（李毅死）故共推之，又以载领南夷龙骧参军。秀奖励战讨，食粮已尽，人但樵草炙鼠为命，秀伺夷怠缓，辄出军掩破，首尾三年……”（《华阳国志·南中志》）。据此，王载是弃官避地，不是现任汉嘉太守，更不能以汉嘉郡投降。《晋书》《明帝纪》、《王逊传》及《通鉴》均云以郡降于成。疑有误。

[52] 《华阳国志·蜀志》越嶲会无县下云：“路通宁州，渡泸，得住（顾校：当作堂）狼（顾校：当作螂，《南中志》作螂）县。”故堂螂县的位置当在金沙江南岸，与会无相对。

[53] 西晋时，中原地区的大地主庄园，如石崇在河阳的金谷园和潘岳在洛阳城郊的庄园都比较典型，金谷园有“金田十顷”（《金谷诗序》）“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清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石崇：《思归引序》）。石崇的金谷园是大官僚、世族地主享受的安乐窝。潘岳《闲居赋》云：“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殖。……菜则

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荠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簇负霜。”潘岳的庄园有多大，他没有说，从庄园内的房屋、池沼、树木，果园、菜圃的布局和游乐的设施看来，它的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潘岳庄园内所种植的东西，自然要保障供应自家的消费，此外，还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他在《序》里说：“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象潘岳的庄园又兼有为市场提供商品的一方面，特别是水碓，“春税足以代耕”则主要对外加工，收取加工费。

[54] 《陈书·蔡凝传》云：“高祖尝问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唯陛下裁之。”

[55] 《隋书·经籍志》杂史类有“《汉之书》十卷，常璩撰。”《旧唐书，经籍志》杂伪国史类有“《蜀李书》九卷，常璩撰。”《新唐书·艺文志》伪史类有“常璩……《汉之书》十卷,《蜀李书》九卷。”《汉之书》即《蜀李书》,见《颜氏家训·书证篇》,而《新唐书·艺文志》误为二书。《蜀李书》或称《李蜀书》。

[56] 唐以前的方志，仅存《三辅黄图》和《华阳国志》。《华阳国志》至宋代已有缺损，“观者莫晓所谓。”自宋以后，许多人对此书作过校勘，功不可灭。《四库总目提要》史部载记类述其经过云：“……宋元丰中，吕大防尝刻于成都，大防为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壁序，称：吕刻刓阙，观者莫晓所谓，尝博访善本，以证其误，而莫之或得，因摭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前后失序，本末舛迕者，则考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壁附记，称：《李势志》传写脱漏，续成以补其阙。则是书又于阙阔之余，李壁为之补缀窜易，非尽璩之旧矣。壁刻本世亦不传，今所传者，惟影写本，又有何镗《汉魏丛书》、吴琯《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三本，何、吴二家之本多张佳允所补。《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而佚去，(蜀中士女》以下至《犍为士女》共二卷，盖壁本第十卷分上、中、下，镗等仅刻其下卷也。又惟《后贤志》中二十人有赞，其余并阙，壁本则蜀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女士（当是士女颠倒——引者）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赞，宇度本亦同，盖明刻书好以意为刊削。新本既行，旧本渐泯，原书遂不可觏。宇度之本从壁本录出，此二卷偶存，亦天幸也。……。”“到了清代，翻刻和校刻此书的就有五十多家，……其中最

好的当推李调元在通州的‘函海’本（1782），他是根据惠栋等许多人校勘精刻的。又有廖寅的南京刻题襟馆本，是根据顾广圻等人校勘精刻的。还有浙江剜改的《汉魏丛书》本，是依据卢文弨校稿剜补的。上海隐修堂刻《龙溪精舍丛书》本，附有顾观光校勘记。邻水李铁船悔过斋补刻题襟馆本，附有陶浚宣题记。……最近成都志古堂翻刻廖本（解放后，四川人民出版社据之影印——引者），也是容易购得的多版本”（任乃强：《华阳国志》简介，见《历史知识》1980 年 2 期）。

[57] 《三国志 · 吴志 · 孙坚、孙策传》评曰：“……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孙）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

[58] 《左传》隐公三年云：“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帝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

[59] 《晋书 · 李势载记》云：“势弟大将军、汉王广以势无子，求为太弟，势不许。”皇帝的法定继承人为太子。皇帝的长孙称太孙，如太子死，册立为太孙，则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晋朝八王之乱中，“河间王颙表（成都王）颖宜为储副，遂废太子覃，立颖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晋书 · 成都王颖传》）。故李广求立为太弟，意在作李势的法定继承人。

[60] 《晋书 · 庾亮传》云：“遣偏军伐蜀，至江阳，执伪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送于京都。”《晋书 · 成帝纪》云：咸康五年“夏四月辛未，征西将军庾亮遣参军赵松击巴郡、江阳，获石季龙将李闳、黄植等。”《纪》、《传》都说晋军伐蜀（李闳为石季龙将，显系错误）到了江阳，江阳属江阳郡，在巴郡以西，而所执守将一为征东将军、荆州刺史李闳，一为巴郡太守黄植，汉的荆州刺史李闳镇巴郡，故晋军止于巴郡的江州，江阳乃江州之误。

[61] “温次青衣。”（《晋书 · 李势载记》）青衣在哪里？胡三省说：“青衣县，汉属蜀郡；后汉顺帝阳嘉三年，更名汉嘉；蜀立为汉嘉郡。刘昫曰：眉州青神县临青衣江，西魏置青衣县。青衣水出卢山徼外，东

北流至武阳而合于江。杜佑曰：嘉州故夜郎国，汉武帝开置犍为郡，治龙游县，汉之青衣道也，在大江、青衣二水之会。”胡三省对青衣县的定点是混乱的。欧阳忞已经辩论过了。欧阳说：“青衣水出卢山徼外，东南流径严道、洪雅、夹江至龙游而与岷江合。龙游居青衣水口，有青水山、青衣津，故前世于此置青州、嘉州，不知龙游乃南安故地，非青衣、汉嘉本土也。唐颜师古注《汉书·彭越传》、杜佑述《通典》嘉州事，皆以龙游为青衣，盖失之矣”（《舆地广记·成都府路》）。胡三省把“温次青衣”之青衣定在汉代蜀郡的青衣县（今荥经县）和唐代的龙游县（今乐山市）是错误的，但引刘昫“西魏置青衣县”却值得考虑。《元和志·剑南道》眉州青神县下云：“本汉南安县地，李雄之后，夷僚内侵，西魏恭帝遥于此置青衣县，属眉州之青城郡。”西魏的青衣县“本治思濛水口”（《寰宇记·剑南道》）。思濛水口在现在的青神县南约八公里处，即今天的瑞丰公社。岷江从青神县向南流，至瑞丰公社折而西流，至波罗公社十一公里，再转向南流。这十一公里岷江乃是东西流向，《载记》所谓江南、江北就是在这一段地方。青衣县治在思濛水南。《晋志》犍为郡无青衣县，唐代嘉、眉二州也无青衣县，为何《载记》说“温次青衣？”原因是：唐人修《晋书》，沿用西魏时的旧县名，以示典雅。这种不良习惯，刘知几已经批评过。他在《史通·内篇·邑里》中说：“……州郡则废置不恒，名目则古今各异，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62] 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祠庙》有云：“武侯在府西北二里，今为乘烟观。”……孔明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

[63] 白水城即白水县城。两汉广汉郡有白水县。蜀汉，白水县属梓潼郡，晋、成因之。道光《昭化县志·舆地·古迹》云：“汉白水县故城在今治北一百四十里白水镇北之白隍坝，城垣故迹犹存。扼阳平、阴平之要，而地势平旷，白水、西谷两环之。”故址当在今青川县境内。

[64]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即所谓度田。又：度田诏下的次年，“郡国大姓及兵长强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异四州尤甚”。

[65] 胡三省云：“扬州统十八郡；（惠）帝割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建安、南康、晋安属江州，扬州统十一郡。今止推（顾）秘督丹阳、

宣城、毗陵、吴、吴兴、会稽、东阳、兴安、临海九郡；淮南、庐江在江北，不与也。”

[66] 建康先名建业，愍帝名邺，及即位，避讳，改为建康。

[67] 《晋书·愍帝纪》：愍帝建兴元年五月，“以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并诏：“……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通鉴·晋纪》：这年八月，愍帝特使刘蜀到达建康，催促发兵，“睿辞以方平定江南，未暇北伐。”此时更谈不到在西面的大成。

[68] 市，《说文》：“买卖所也。”官府指定地点，划定范围，作为商品交易的场所，并设市官管理。成都市的建立，远自秦时。张若为蜀郡守，“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华阳国志·蜀志》)。

[69] 《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之）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70] 《汉书·货殖传》云：“……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钜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

[71] 《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序》云：“司马错之于蜀侯，邓艾、锺会之于后主，尉迟迥之于肖纪，郭崇韬之于王衍，王全斌之孟昶，此以栈道亡蜀者也。岑彭、吴汉之于公孙述，桓温之于李势，朱龄石之于谯纵，汤和之于明升，此以江道亡蜀者也。”

# 成·汉大事记

## 公元三〇一年　西晋永宁元年

正月，赵王伦篡位。

赵廞杀李庠。李特等平赵廞之乱，入成都。特遣使至洛阳陈廞罪状。朝廷以讨赵廞功拜李特为宣威将军、封长乐乡侯，李流为奋威将军、武阳侯。

三月，新任益州刺史罗尚到达成都。

齐王冏告三王起兵讨赵王伦。

闰三月，伦败，惠帝复位，诛伦及其诸子、党与。

六月，齐王冏率众入洛阳，甲士数十万。齐王冏为大司马。

朝廷下符秦、雍，使召还流民入蜀者。罗尚限流民七月上道。流民请延期，不许。

七月，罗尚移书梓潼所在抱关。

八月，关皆成。

九月，罗尚遣军于绵竹。辛冉悬赏，购李特、李流首百匹。

十月，李特结大营于绵竹东北之赤祖。李特称镇北大将

军、益州牧，李流称镇东大将军，流民政权初建。　辛冉遣军攻流民营，被流民军击败。流民军进围广汉太守辛冉于雒，冉突围走。　李特以李超为广汉太守。进迫成都。　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罗尚建郫江防线。　李特引军退保广汉。

公元三〇二年　太安元年

春，官军三路进攻流民军：河间王颙派衙博军梓潼，流民军李荡率军抵御；罗尚遣张龟军繁城，李特组织力量反攻；广汉太守张徵在德阳。

五月，李荡全歼衙博。繁城方面的战斗结束之后，开始德阳方面的战斗。

八月，杀张徵。特以蹇硕守德阳。

秋，南中大姓毛诜、李叡逐建宁太守杜俊、朱提太守雍约起兵，众各数万，响应李特。

十一月，晋复置宁州，以李毅为刺史。齐王冏专政。

十二月，河间王颙讨齐王冏，杀之。

公元三〇三年　太安二年　李特建初元年

正月，李特破罗尚郫县防线，晋蜀郡太守降，李特入据少城，改元建初。罗尚保太城，遣使向李特求和。村保——地主武装归附李特。荆州援益州的水军三万，前锋至德阳，罗尚派人勾结诸村保，阴谋攻击李特。

二月，罗尚遣兵掩袭李特，诸村保同时俱发，特兵大败。李特向繁城撤退，败死。李流、李雄合余众还保赤祖。李流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

孙阜破德阳，获蹇硕，任臧退屯涪县。

三月，罗尚遣张龟等驻繁城，常深驻毗桥。涪城药绅等反，响应罗尚，寻为流民军所败。

五月，李流向孙阜投降。李雄、李离等反击孙阜，取胜；宋岱病死，荆州军退出益州。李雄统军。　义阳蛮张昌起义于江夏。

七月，李雄占领郫城。流民军饥。范长生资给军粮。张昌下江南诸郡。昌别帅石冰下扬州诸郡。临淮人封云响应，入徐州。

八月，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乂。张昌败。

九月，李流病卒。流民推李雄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治郫城。李雄进攻成都，入少城。李骧攻犍为，俘太守，断罗尚粮道。

十一月，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幽于金墉城，寻死。江南豪族周玘等攻石冰。

闰十二月，李雄攻尚，尚弃城逃走，流民军占领成都全城。李骧率众就食于郪。

公元三〇四年　永兴元年　成都王李雄建兴元年

正月，罗尚逃至江阳。西晋朝廷诏尚权统巴东、巴郡、涪陵以供军赋。尚遣使向荆州刺史刘弘告急求粮。

三月，西晋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颖表刘渊为冠军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石冰败死。

七月，东海王越等讨太弟颖，众十余万，朝廷六军败于荡阴。

八月，荆州兵杀张昌。匈奴左贤王刘渊反于离石，自号大单于。

十月，李雄即成都王位，建元建兴，具置百官，除晋法，约法七章。

刘渊迁都左国城，称汉王，建元元熙。

惠帝还洛阳，河间王颙部下张方拥兵专朝政。

十一月，罗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俘李骧妻、子。

张方挟惠帝入长安。

十二月，李雄太尉李离伐汉中，杀都战帅赵汶。

惠帝诏：太弟颖以成都王还第。以河间勇顺都督中外诸军事。

公元三〇五年　永兴二年　建兴二年

七月，东海王越檄山东征、镇、州、郡迎惠帝还洛阳。

八月，豫州刺史刘乔拒绝东海王越的调动。河间王颙表成都王颖都督河北诸军。

十二月，成都王颖入据洛阳。

陈敏据有江东，自称楚公。

公元三〇六年　光熙元年　大成晏平元年

正月，惠帝在长安。破刘乔。成都王颖奔长安。

三月，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苓夷屡败宁州官兵，围州城。宁州刺史李毅死。宁州将吏推毅女李秀领州事，闭城自守。

范长生从青城山来到成都。

五月，颙、颖奔宛。

六月，成都王雄即帝位，国号大成，改元晏平。

惠帝还洛阳。改元。

八月，以太傅、东海王越录尚书事。执成都王颖。

九月，赐颖死。

十一月，惠帝食讲中毒死。皇太弟炽即位，是为怀帝。

十二月，南阳王模杀河间王颙。

公元三〇七年　怀帝永嘉元年　晏平二年

二月，罗尚施关戍至汉安僰道。陈敏败死。

三月，关中流民邓定、訇氐等掠汉中。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围之。訇氐求救于李雄。

五月，李雄遣李离、李云、李璜、李凤率军二万入汉中救邓定，大败梁州兵。

七月，西晋以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

九月，琅琊王至建邺。

石勒降汉。

十二月，西晋王逊为宁州刺史。东海王越自为丞相，领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诸军事。

公元三〇八年　永嘉二年　晏平三年

十月，汉王刘渊即皇帝位，国号汉。

十二月，成尚书令杨褒卒。平寇将军李凤屯晋寿，屡攻汉中，汉中民东走荆沔。

晋以张光为梁州刺史，治新城。

公元三〇九年　永嘉三年　晏平四年

正月，刘渊迁都平阳。

三月，东海王越入洛阳，勒兵入宫，杀近臣十余人。

八月，汉兵攻洛阳。

九月，天水人訇琦等杀成太尉李离、尚书令阎式，以梓潼降罗尚。李雄遣李骧、李云、李璜攻之，不克，云、璜战死。

十月　汉兵再攻洛阳。

公元三一〇年　永嘉四年　晏平五年

二月，成太尉李国镇巴西，帐下文硕杀国以巴西降罗尚。

四月，成收复梓潼。

七月，罗尚卒于巴郡。皮素为益州刺史。

汉帝刘渊死，子和嗣立，和弟聪杀和自立。

九月，雍州流民多在南阳，王如率流民起义于宛。

十月，汉攻洛阳、襄阳。

十一月，汉太傅李骧攻谯登于涪城。

十二月，皮素至巴郡，为降人所杀。巴郡乱。巴东监军韩松为益州刺史、西夷校尉，治巴东。

是岁，宁州刺史王逊到达任所。

公元三一一年　永嘉五年　玉衡元年

正月，怀帝密诏讨越。

石勒入江夏，太守杨岷奔武昌。

李骧下涪城。李始拔巴西。李雄改元。

杜弢领导荆湘流民起义。

成叛将苻成、隗文复叛于宜都，西上巴东。

成军攻僰道，走犍为太守魏纪，杀江阳太守姚袭。

二月，隗文等反于巴东。暴重讨之，未下。重杀韩松，自领三府事。

三月，三府吏共杀暴重，表巴郡太守张罗行三府事，治枳。张罗自讨隗文，败死。隗文略吏民西上降成。成将任回获晋犍为太守魏纪。王异行三府事、领巴郡太守。晋梁州刺史张光复治汉中。东海王越卒于项。

四月，石勒轻骑追越丧，晋王公以下死者十余万人。

六月，汉刘曜、王弥入洛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俘怀帝。

八月，汉刘粲攻陷长安。

十月，石勒寇豫州诸郡，至江而退。

公元三一二年　永嘉六年　玉衡二年

二月，石勒将攻建邺，琅琊王睿大集江南之众于寿春以讨之，会大雨，三月不止，勒军饥疫，死者太半，石勒退。

八月，晋阴平都尉董冲逐太守王鉴，以郡降于成。

晋龙骧将军、江阳太守张启与罗琦杀王异，张启行三府事，罗琦行巴郡太守。启病亡，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率吏民南入涪陵。

公元三一三年　愍帝建兴元年　玉衡三年

春，向沈卒。晋蜀郡太守程融等共推汶山太守兰维为西夷校尉。融等想东下巴东，为李雄将李恭、费黑所破获。

四月，汉刘聪已害怀帝于平阳。消息传到洛阳，愍帝即位，改元。

王如余入汉中。

六月，氐王杨茂搜助王如余部，大破梁州军。

是时，山东郡邑相继陷于石勒。

八月，氐王遣杨难敌助杨虎（王如余党），大破梁州兵，擒张光子孟苌，杀之。

九月，梁州刺史张光恚死。州人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领州。

十月，杨虎与杨茂搜急攻梁州城，胡子序弃城走。虎得州，自称刺史。

公元三一四年　建兴二年　玉衡四年

正月，杨虎率汉中吏民奔成。梁州人张威等以梁州归成。梁州入大成版图。成以李凤为梁州刺史，任回为宁州刺史，李恭为荆州刺史。李雄兴学校，置史官，减轻赋、调。

二月，晋以张轨为太尉、凉州牧。

五月，张轨卒，子寔嗣。

七月，汉刘曜、赵冉攻长安。

公元三一五年　建兴三年　玉衡五年

二月，朝廷以琅邪王睿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

八月，杜弢屡经战斗，将士多死。弢部将王贡降，弢众溃，遁走，道死。杜弢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

公元三一六年　建兴三年　玉衡六年

五月，平夷太守雷炤、平乐太守董霸帅三千余家降于成。

八月，汉刘曜攻长安，内外断绝。

十一月，愍帝出降，迁于平阳。

公元三一七年　晋王司马睿建武元年　玉衡七年

正月，李雄遣李恭、罗演攻巴东。

三月，琅琊王睿即晋王位于建康，改元建武。

十二月，刘聪杀愍帝。

公元三一八年　东晋元帝太兴元年　玉衡八年

三月，晋王睿即帝位。

四月，成丞相范长生卒。成帝雄以其子贲为丞相。

七月，汉帝刘聪卒，太子粲嗣。

八月，汉大司空、领司隶校尉，外戚靳准杀刘粲，自号汉天王。

十月，刘曜称帝。封石勒为赵公。

十二月，杀靳准。

成梁州刺史李凤（有功，李荡子稚疾之）以巴西叛，李骧讨斩之；以李寿知梁州、征北事。

公元三一九年　太兴二年　玉衡九年

成李骧伐越嶲，又分伐朱提。

四月，刘曜迁都长安。

六月，汉帝刘曜改国号曰赵（史称前赵）。

秦州刺史陈安先降于赵，又降于成。

十一月，石勒称赵王。

公元三二〇年　太兴三年　玉衡十年

李骧获晋越嶲太守李钊。

公元三二二年　永昌元年　玉衡十二年

正月，晋大将王敦反于武昌。

三月，晋廷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讨王敦。

四月，王敦入据石头城，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封武昌郡公，还武昌。

闰十一月，元帝卒。

公元三二三年　明帝太宁元年　玉衡十三年

正月，成李骧、任回攻台登，晋将军司马玖死于此。越嶲太守李钊（被俘后又逃回宁州）、汉嘉太守王载降于骧。

五月，李骧等攻宁州，晋刺史王逊遣将姚岳御之，战于堂狼，大破李骧。

越嶲斯叟反，围攻任回及太守李谦，李雄遣征南大将军费黑救之。

七月，刘曜攻陈安于陇城，灭之。赵攻仇池，氐杨难敌与弟坚头奔汉中。刘曜以田崧镇仇池。难敌兄弟奔晋寿，降于成。赵兵退，难敌还武都，叛。成发兵讨之，不利，李稚、李琀皆死。

公元三二四年　太宁二年　玉衡十四年

正月，成帝雄立兄子班为太子。

五月，凉王张茂卒，子骏嗣。

六月，王敦再反。

七月，王敦死，军溃，乱平。

十二月，梁水太守爨亮、益州太守李逷以兴古郡降于成。

公元三二五年　太宁三年　玉衡十五年

闰七月，明帝卒。

是岁，宁州刺史尹奉到任，重募徼外夷刺爨亮，谕降李逷。

公元三二六年　成帝咸和元年　玉衡十六年

夏，成破越嶲斯臾。

九月，成将张龙攻涪陵，执太守谢俊。

是岁，凉王张骏惧刘曜之逼，使聘于成，以修邻好。

公元三二七年　咸和二年　玉衡十七年

正月，宁州秀才宠遗起兵攻成将任回、李谦，李雄遣将罗恒、费黑救之。晋宁州刺史尹奉遣裨将姚岳、朱提太守杨

术援遗，战于台登，晋兵败，杨术死。李谦移越嶲郡民于蜀。

十一月，晋历阳内史苏峻、豫州刺史祖约反。

公元三二八年　咸和三年　玉衡十八年

二月，苏峻至建康。峻矫诏大赦，又以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

五月，晋征西将军陶侃等起兵讨峻。

九月，苏峻败死。

十月，成将张龙攻涪陵。

冬，成太傅李骧卒，寿以丧还。拜李玝为征北将军、梁州刺史，代寿。太子班行抚军将军，修晋寿军屯。

公元三二九年　咸和四年　玉衡十九年

正月，祖约奔石勒。石勒取长安。

九月，石勒将石季龙击刘胤，斩之，尽灭刘氏，坑其党三千余人。前赵亡。

公元三三〇年　咸和五年　玉衡二十年

二月，石勒称赵天王，行皇帝事。

九月，石勒称帝。石勒遣其将入襄阳。

冬，成拜李寿为督中外诸军、大将军、中护军、西夷校尉、录尚书事。寿率征南将军费黑、征东将军任邵伐巴东，至建平，晋巴东监军毋丘奥、建平太守杨谦退保宜都。

十二月，张骏称臣于石勒。

公元三三一年　咸和六年　玉衡二十一年

春，成大将李寿还成都。任邵屯巴郡。李雄以子越为车骑将军，屯广汉。

秋，李寿伐阴平。

公元三三二年　咸和七年　玉衡二十二年

秋，李寿南征宁州。

十月，李寿、费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晋宁州刺史尹奉遣建宁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

公元三三三年　咸和八年　玉衡二十三年

正月，成兵围朱提百日，晋太守霍彪、董炳出降。

三月，晋宁州刺史尹奉举州委质，迁奉于蜀。李寿领宁州。

夏，张骏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成，请假道通表建康，不果。

秋，建宁民毛衍、罗屯等反，杀成太守邵攀。牂柯太守举郡为晋，李寿破之。

公元三三四年　咸和九年　玉衡二十四年

春，成分宁州置交州，以霍彪为宁州刺史，爨深为交州刺史。封李寿为建宁王，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张骏遣使遗李雄书，劝雄去尊号称藩于晋。此后，成、凉使聘相继。

三月，李寿还成都。

六月，李雄卒。李寿受遗诏辅政。太子班即位，以建宁王寿录尚书事。

十月，雄子车骑将军越杀李班。李期即皇帝位。以越为相国，与寿并录尚书事。进寿大都督，徙封汉王。封越建宁王。李期使李寿讨李玝，玝奔晋。拜寿梁州刺史、知北事。

十一月，赵石虎杀其主弘，自立为摄天王。

公元三三五年　咸康元年　李期玉恒元年

正月，东晋成帝改元。

九月，李班之舅罗演与汉王相上官澹谋杀李期，立班子。事觉，期杀演、澹及班母。

公元三三六年　咸康二年　玉恒二年

十月，晋广州刺史邓岳遣王随击夜郎，陶协击兴古，并克之。

成尚书仆射武陵公李载，李期诬以谋反，杀之。

十一月，晋遣建威将军司马勋安集汉中，为成李寿所败，寿遂置汉中守宰，戍南郑而还。

公元三三七年　咸康三年　玉恒三年

正月，赵王虎称赵天王。

公元三三八年　咸康四年　汉李寿汉兴元年

四月，李寿自涪率精骑一万赴成都，废期自立，改国号汉，建元汉兴。以董皎为相国，罗恒为尚书令，解思明为广

汉太守，任调镇北将军、梁州刺史，李奕西夷校尉，从子权为宁州刺史。卿佐皆用宿人，成都诸李子弟无复秉兵马形势者，雄时旧臣及六郡人皆被斥废。

七月，李奕从兄李乾与大臣合谋废季寿，寿使子广与大臣盟，约为兄弟，进李闳为征东大将军、荆州刺史，移镇巴东。

九月，汉仆射任颜（李雄妻弟）谋反，诛。汉帝寿尽诛李雄诸子。

公元三三九年　咸康五年　汉兴二年

二月，晋将伐巴东，获汉镇将李闳。

三月，汉拜李奕为镇东大将军。

夏，晋广州刺史邓岳将兵攻宁州，成建宁太守孟彦缚刺史霍彪以郡降晋。汉遣右将军李位都讨之。

十二月，汉李奕击巴东，晋守将劳扬战败，死。

公元三四〇年　咸康六年　汉兴三年

三月，汉将攻拔丹川，晋守将死之。

九月，先，赵王虎遗李寿书，欲与联兵攻晋，中分江南。是月，汉以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集士卒七万余人为舟师，大阅于成都。

是岁，李闳（被晋俘后，奔赵，李寿致书赵王虎请之）自赵返成都。

公元三四一年　咸康七年　汉兴四年

汉帝寿以太子势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自李闳从邺还，盛称邺中繁富，宫殿壮丽；且言赵王虎以刑杀御下；寿慕之，徙傍郡民三丁以上实成都，大修宫室。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皆坐直谏死。

公元三四二年　咸康八年　汉兴五年

六月，晋成帝卒。

公元三四三年　康帝建元元年　汉兴六年

八月，汉帝李寿卒。

公元三四四年　建元二年　李势太和元年

势弟广求立为太弟，马当、解思明劝之，势疑有谋，收马当、解思明杀之，广自杀。

九月，晋巴东太守杨谦攻汉将申阳，走之。康帝卒。

公元三三五年　穆帝永和元年　太和二年

八月，晋以桓温持节、都督荆·司·雍·梁·益·宁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十二月，汉将爨頠奔晋。

公元三四六年　永和二年　嘉宁元年

十月，汉太保李奕自晋寿举兵反，蜀人多从，众数万；奕

攻成都，被射死。李势改元嘉宁。

十一月，桓温帅师伐汉。

公元三四七年　永和三年　嘉宁二年

二月，桓温军次青衣。

三月，温至彭模。推锋成都。十七日，李势送降文于温。汉亡。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OCR、校对
2008年4月20日星期日
9:37:28